

玉丁寧館捐贈牙骨器研究——漢代以前

嵇若昕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內容提要】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不少名寶上珍，其中亦不乏牙骨雕刻品，但是多為有清代遺物，獨缺上古骨器。一九九七年「玉丁寧館」將多年購藏牙骨竹木雕器，擇其精尤，縱貫五六千年不替，上自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雕骨嵌石大刀，下迄清末民國的象牙竹木雕刻品，共計二三七組件（二九六單件）捐補院藏。今僅選撫所捐漢代與漢代以前牙骨器中具代表性者，依據出土、傳世或流散文物，以及其他相關資料，排比、分析，以略窺先民至漢代為止在牙骨雕刻工藝上的發展史序與特殊成就。遠在數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先民已知利用漁獵所得的獸骨、牙材，磋製成簡單的生產工具或裝飾品。降及新石器時代，牙骨製品進而成為當時工藝美術的一環，或為椎，或製刀，或作飾物。商代以銅器藝術為重心，但是在牙骨雕刻方面仍有長足的進展，不但表現牙骨質材的本色，也常在牙骨雕刻品上鑲嵌綠松石等寶石為飾；西周延續商代風格，牙骨器的雕刻與鑲嵌工藝並存；春秋戰國時期，加入了彩繪、嵌金絲與烙印等工藝，更增加當時牙骨器的華麗。漢代漆器工藝中的針刻藝術，深受世人推崇，此時牙骨器上的針刻技藝，與之並行不悖；除了針刻，尚常在陰線刻痕內填入各色彩料，踵事增華。文末並藉玉丁寧館捐贈的十件牙骨梳篦或梳柄，略窺我國梳篦形式的發展史。

除了石材，牙、骨、竹、木等也是上古先民易得而熟悉的質材。當時，石材與竹木隨處可取；漁獵所得作為食物，食餘的牙骨便可磋製成工具或裝飾品。竹木易朽，不易保存，石材堅硬，不易磨製，牙骨質材介於兩者之間，兼具兩者之美，遂在古代遺物中最能表現先民雕刻技藝。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不少名寶上珍，其中亦不乏牙骨雕刻品，但是多為有清一代遺物，獨缺上古骨器。院長秦心波先生深諳院藏之憾，多年來心懷拾遺補闕之意，留心收集坊肆牙骨雕刻器，並搭配收藏竹木精品。民國八十六年（一九九七）秦院長將多年購藏，擇其精尤，縱貫五六千年不替，上自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雕骨嵌石大刀，下迄清末民國的象牙竹木雕刻品，共計二三七組件（二九六單件），以「玉丁寧館」之齋名捐補院藏。

由於質材與工藝性能的相近，考古學者在分析所發掘文物時，常將牙、骨、角並列，有時也不細分牙質、骨質或角質。《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鄭玄注云：「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象」指象牙，磋象即雕牙，是一種專業化的技藝。不過象牙比較珍貴，某些先民甚至視象牙為厭勝的靈物而將其成堆埋入土中，例如四川廣漢三星堆一、二號坑內堆積的象牙，有學者即認為其功能與巫山大溪文化遺址墓葬中的象牙一樣，是作為靈物而被埋入土中。【註一】因此，以象牙為材製成的器用應非一般人所能常用。先民通常使用骨、牙磋商製器用時，所採用的工藝技術與磋商製象牙者相同，故而本文在行文時並不刻意細分一般牙骨或象牙，甚至有時亦將角器列入。

在收集相關資料，俾便進行排比、分析與歸納工作時，發現隨著歷史的演進，先民從蒙昧進入文明，於新石器時代晚期逐漸加速發展，遂綿延不斷地前進，至漢代而從未間斷，但是似乎進展至東漢後期，隨著政局的變動，外族文化的參與，佛教思想的普及等等因素，文化發展方向有所轉變，與漢代以前的差異性逐漸增加。表現在器物藝術方面，即是銅器、玉器、漆器等藝術風格不變，原傳承了數千年的藝術文化，露出無以為繼的現象，表現在牙骨器上也出現牙骨器的使用頻率減低，裝飾方式比較缺乏特色而降低藝術性等情況，必須遲至明清時期，象牙雕刻工藝才再度顯露光芒，並在清乾隆朝前後達於顛峰。由是之故，今僅選撫玉丁寧館捐贈的漢代與漢代以前牙骨器中具代表性者，依據出土、傳世或流散文物，以及其他相關

【註一】：江玉祥，〈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的象牙〉，收於李紹明、林向、趙殿增主編，《三星堆與巴蜀文化》（成都：巴蜀書社，一九九三年十一月），頁一九八至二〇四。

資料，排比、分析，冀期窺得先民至漢代為止在牙骨雕刻工藝上的發展史序與特殊成就。

第一節 夏代以前

遠在數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先民已知利用漁獵所得的獸骨、牙材，磋製成簡單的生產工具或裝飾品。降及新石器時代，牙骨製品進而成為當時工藝美術的一環，或為椎，或製刀，或作飾物，甚至製成與當時先民宗教信仰或禮制等級相關的器用，例如河姆渡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鳥紋牙骨器即被認為與信仰有關（見下文），而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一件象牙雕刻品，在墓內置於人骨的左上，器表凹凸兩面滿刻精細神獸面紋，考古學者認為是權力和地位的象徵，是一種禮器，是等級的反映。【註二】

當時牙骨器的製作，不見得少於石器，以浙江餘姚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為例，這個遺址位於姚江邊，海拔高度已低於今日海平面。由於地下水位高，使得地下文物，特別是有機質文物得以大量保存。河姆渡遺址的文化遺存分為四期，第一期文化遺存的絕對年代距今七〇〇〇至六五〇〇年，第二期文化遺存的絕對年代距今六五〇〇至六〇〇〇年，第三期文化遺存的絕對年代距今六〇〇〇至五五〇〇年，第四期文化遺存的絕對年代距今五五〇〇至五〇〇〇年。【註三】除了地下水位高，河姆渡遺址覆蓋在第一至第二期文化遺存和第三至第四期文化遺存之上的泥質海相沈積層，厚達數公分至一百多公分，使得四個文化遺存與空氣完全隔絕，而免遭外力侵蝕破壞。再加上所處的地球環境分佈特徵，是河姆渡遺址的四個文化層能夠完好保存至今的必需條件。【註四】在四期文化遺存中，又以第一期文化遺存中的保存狀況最令人滿意，此期所大量發現的骨、角、木器，為其他任何一期無法比擬。在第一期文化遺存的生產工具類中，石器僅三八五件，骨器就有一九三四件，是「當

【註二】：黃宣佩，〈福泉山遺址發現的文明跡象〉，《考古》（北京，科學）一九九三年第二期，頁一四四至一四九與頁一六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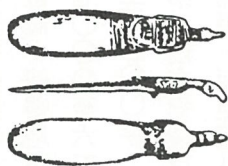
【註三】：劉軍、姚仲源，〈中國河姆渡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月），頁四。

【註四】：郎鴻儒，〈浙江餘姚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與全新世海面的變化〉，《浙江地質》一九八七年第三期，轉引自同前書，頁三。

時主要生產工具」；在生活用具中，骨器也有一三〇件；此外尚有牙骨飾一七件，骨簪一三件，象牙鳥形圓雕三件，以及象牙蝶形器。在第二期文化遺存生產工具類中，骨器仍比石器多多了，前者有一〇一四件，後者僅有二八三件；此外尚有骨質生活用具與裝飾品等。第三期文化遺存生產工具類中，石器（一一九件）就比骨器（四九件）多些。第四期文化遺存生產工具類中，僅發表有石器與陶器，生活用具中不見骨器。【註五】



插圖一 雕骨雙頭鳥紋飾件



插圖二 雕象牙鳥形匕



插圖三 雕象牙雙鳥朝陽器以上皆河姆渡文化遺址出土

在其他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物中，不乏牙骨器的出土，但是或許因為遺址保存狀況不如河姆渡文化遺址的保存狀況如此理想，牙骨器不見得比石器多。無論如何，當時使用牙骨器相當普遍，至於所用的材料，多取自獸類，也取自魚類與鳥類。選材後，便進行裁切、成

形、打磨等工序。此時的牙骨器多為光素者，但是也不乏以陰刻線紋為飾者，例如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六年在青海省同德縣距今約六千年左右的宗日遺址進行發掘時，出土由骨片圍成筒狀的腕飾即有陰線刻劃的三角紋飾痕跡。【註六】眾多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有陰線紋飾的骨器中，以河姆渡文化遺址出土者最受矚目，例如出土於第一期文化遺存中的雕骨雙頭鳥紋飾件（插圖一）、雕象牙鳥形匕（插圖二）與第二期文化遺存中的雕象牙雙鳥朝陽器（插圖三）。學者多認為河姆渡文化遺址

【註五】：劉軍、姚仲源，《中國河姆渡文化》，頁九至三八。

【註六】：青海省文物管理處、海南州民族博物館，《青海同德縣宗日遺址發掘簡報》，《考古》一九九八年第五期，頁一至二六。

出土的蝶形器與前述具鳥紋的牙骨器，是當時人以鳥為圖騰的宗教反映，至於雙鳥朝陽紋飾，也有學者認為是卵生神話傳說的反映，故應是雙鳥朝卵，而卵生神話傳說又與生殖崇拜有關。【註七】

除了陰線刻紋外，新石器時代的牙骨器上，也出現鑲嵌彩石為飾的情形，最著名的例子是出土於山東泰安大汶口文化遺址中的雕骨三角形筒上，鑲嵌了五個綠松石片。【註八】

玉丁寧館捐贈的新石器時代牙骨器中，缺乏具有陰線刻紋或者鑲嵌彩石的器物，但是兩件具有凹槽的骨刀，雖然僅是先民的生產工具或生活用具，卻相當醒目。其中又以仍嵌黏數片石片的骨刀，頗具代表性。這件嵌石骨刀（國贈二八三三五）長二九·五公分，全器截取動物肢骨磨製成直長條刀形，刃部鑿凹槽，嵌入多片磨利的石片，製成獸骨柄石刀；柄端有一長形凹槽並有一孔，以供繫墜或嵌插。（圖一）另一件骨刀（國贈二八三三六）長二四·五公分，全器截取動物勒骨磨製成彎弧刀形，刃部鑿凹槽，俾供嵌入刀片；弧形刀柄對穿一孔，以供繫墜。（圖二）這種鑲嵌石片或石葉為刃的骨器，有人稱之為「石刃骨柄器」或「骨梗石刃器」，以石刃骨刀類發現最多，另外還有匕、鏢等。石刃骨器是磨製骨器與細石器相結合的產物，我國在距今一萬年左右的舊石器時代晚期開始出現這類器用，最早出現在內蒙古地區；新石器時代，在今日內蒙古各地常可見這類石刃骨器【註九】。此外，黑龍江密山新開流【註一〇】、吉林白城靛山【註一一】、青海西寧朱家寨【註一二】、

【註七】：孫其剛，〈河姆渡文化鳥形象探討〉，《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一九八七年第十期，頁一〇至一七。

【註八】：山東省文物管理處、濟南市博物館，〈大汶口——新石器時代墓葬發掘報告〉（北京，文物，一九七四年），頁一〇一、一〇二。

【註九】：連吉林，〈內蒙古史前石刃骨器初論〉，收於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二輯，頁三〇至三七。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考古精華〉（北京，科學，一九九三年十一月），頁一〇四，發表一件出土於遼西興隆洼遺址的骨柄石刃刀，興隆洼文化的碳十四年代約為西元前五五二〇至五二四〇年（未校正）。

【註一〇】：黑龍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隊，〈密山縣新開流遺址〉，《考古學報》（北京，科學）一九七九年第四期，頁四九一至五一八。

【註一一】：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白城靛山墓地發掘簡報〉，《考古》一九八八年第十二期，頁一〇七二至一〇八四。

【註一二】：安特生，〈甘肅考古記〉（農商部地質調查所印，一九二五年），轉引自連吉林，〈內蒙古史前石刃骨器初論〉，頁三七。

樂都柳灣墓地【註一三】和甘肅永昌鴛鴦池【註一四】等地都曾出土石刃骨器；另在西藏昌都卡若遺址也曾見到這類骨器的蹤跡【註一五】。當時，分佈在東北、西北、西南的這類石刃骨器，流行年代大致在西元前六〇〇〇年至一八〇〇年，時間跨度達四〇〇〇年以上；在不同地區流行年代的下限較接近而上限則差別較大。【註一六】進入銅器時代後，因金屬工具的推廣與使用而逐漸消失。自初始出現至新石器時代晚期，石刃骨器都是一種較先進的復合工具。

有學者以為石刃骨刀是史前時期先民在狩獵或飼養動物後，宰殺動物以供食用時，剝皮和切割過程的工具，另外還可作為人們食用肉類時的餐具。至於「一些柄部有孔的石刃骨刀即是人們隨身攜帶，在不同地點宰殺動物、食用肉類時使用」的工具。【註一七】玉丁寧館捐贈的這兩件有凹槽的骨刀【註一八】，或即是先民隨身攜帶備用的器具。

第二節 夏、商與西周

近年來在中國古史的研究上，對於夏代的探索得到不少成就。基本上，將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視為夏代的王國文明所在，至於在內蒙古敖漢旗大甸子村發掘的夏家店下層文化，「應是探討夏代在遼西地區方國的對象。」【註一九】年代為西元前二〇〇〇年至一五〇〇年。在夏代的王國文明中，偃師二里頭遺址是一大都邑，主要遺存屬西元前一九〇〇年至一五〇〇

【註一三】：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對等，《青海柳灣》（北京，文物，一九八四年），頁二八。

【註一四】：甘肅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等，《甘肅永昌鴛鴦池新石器時代墓地》，《考古學報》一九八二年第二期，頁一九九至二二七。

【註一五】：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等，《昌都卡若》（北京，文物，一九八五年），頁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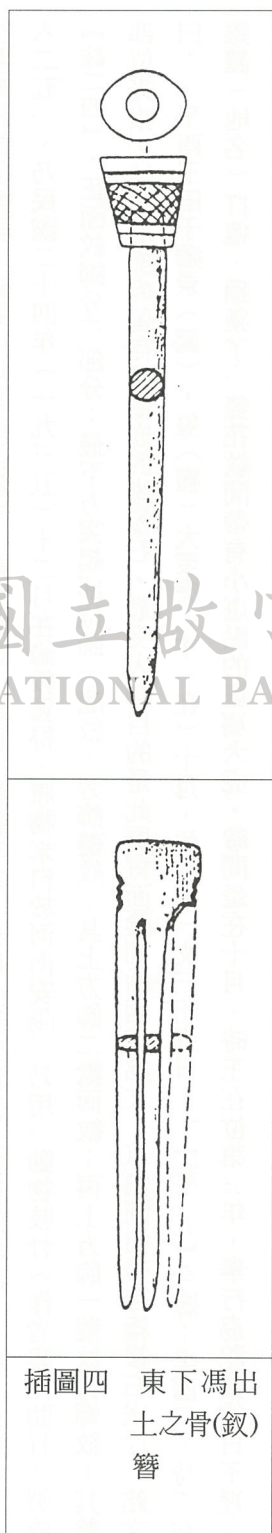
【註一六】：雲翔，《試論石刃骨器》，《考古》一九八八年第九期，頁八二五至八三五。

【註一七】：連吉林，《內蒙古史前石刃骨器初論》，頁三四。

【註一八】：楊美莉，《記玉丁寧館藏的兩件骨柄石刃刀》，《故宮文物月刊》（台北，故宮）第十七卷第一期，頁五六至六九。文中認為（圖一）的骨刀「是一件來自西北地區，屬於半山、馬廠期文化風格之物」，（圖二）骨刀「是屬於青海地區齊家文化風格之物」。

【註一九】：佟柱臣，《中國夏商王國與方國文明試論》，《考古》一九九一年第一期，頁一〇〇三至一〇一八與一〇三一。

○年，雖然已進入銅器時代，但是在遺址的地層中曾出土大量的骨製半成品和鋸骨，可見當時製骨手工業仍相當重要。在大量牙骨器製品中，有一件象牙所製的杖，有四七分長，令人矚目。【註二〇】至於也是典型二里頭文化遺址而出土於山西夏縣東下馮，被稱為東下馮類型的文化遺址，相對年代大致為西元前十九世紀至十六世紀。此處正處於傳說中的「夏墟」範圍之內，遺址中曾出土銅製工具與武器，也出土了不少骨器，生產工具有骨錐、骨針，狩獵工具或武器有骨鏃，生活用具有骨匕等，另有不少卜骨，用豬、牛、羊與極少數的鹿等動物的肩胛骨製成，或有灼無鑽，或有灼有鑽。在裝飾品方面以骨簪最多，絕大多數是頂平端尖的長條形，三齒形（釵）與帶簪帽的圓長條形極少，僅見於第Ⅴ期（東下馮類型共分Ⅵ期）。【註二一】（插圖四）



插圖四 東下馮出土之骨(釵)簪

夏代已進入銅器時代，石、骨、蚌器雖然仍大量使用，但是在形式上「顯著減少」。【註二二】有關夏代的斷代研究仍不斷進行，此時期牙骨器工藝成就尚未梳理出具時代特徵的代表性器物，至於玉丁寧館所捐贈的牙骨器中，也尚難篩選出確定是夏代的文物。

- 【註二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考古精華》，頁一二一。
- 【註二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縣東下馮》（北京，文物，一九八八年十一月），頁一八三至一八五。
- 【註二二】：佟柱臣，《二里頭文化和商周時代金屬器代替石骨蚌器的過程》，《中原文物》（洛陽，河南省博物館）一九八三年第二期，頁二。

進入商代，銅器仍有排斥石、骨、蚌器的情形，在種類上，骨矛、蚌矛到商代晚期不見了；在數量上，骨斧、蚌鑿、蚌鏃、骨魚叉等等數量至微。不過對商代的農業生產而言，石、骨、蚌器仍居主導地位。【註二三】不僅於此，此時牙骨器在工藝上的成就頗有可觀。

首先，在牙骨器上雕刻紋飾的情形一再出現，早在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Royal Oriental Museum of Archaeology）即曾出版懷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撰寫的《古代中國骨器文化》（*Bon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書中發表了不少出土於河南北部的骨器，認為大約是西元前十二世紀之前的文物。除了卜骨與光素的骨器外，有不少雕刻紋飾的骨器，紋飾中以獸面紋為主，兼有龍紋、夔紋、蟬紋等等，都是商後期銅器上常見的紋飾，其中一件編號NB六二五一，乃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二月在倫敦獲得，原物來自於河南安陽，乃用一動物肢骨（作者誤作肋骨）製成【註二四】，正面紋飾分三部分：最下方突起部位飾一龍紋，旁飾夔紋；其上方飾二獸面紋；再上方飾一夔紋與蟬紋；其餘部位光素。紋飾局部尚留存原鑲嵌的綠松石。最受人矚目的是此器背面陰刻的兩行銘文，筆劃間尚殘存綠松石嵌片，銘文曰：「辛酉王田于雞隴（雞，隻）獲（獲）大靈虎。才（在）十月，佳（唯）文三祀。勿日。」【註二五】今譯：辛酉日，時王在雞隴（地名）打獵，獵獲了一隻花紋間帶有小斑點的斑斕大虎。時間是在十月，時王在位第三年，舉行祭祀典的日子裡。（插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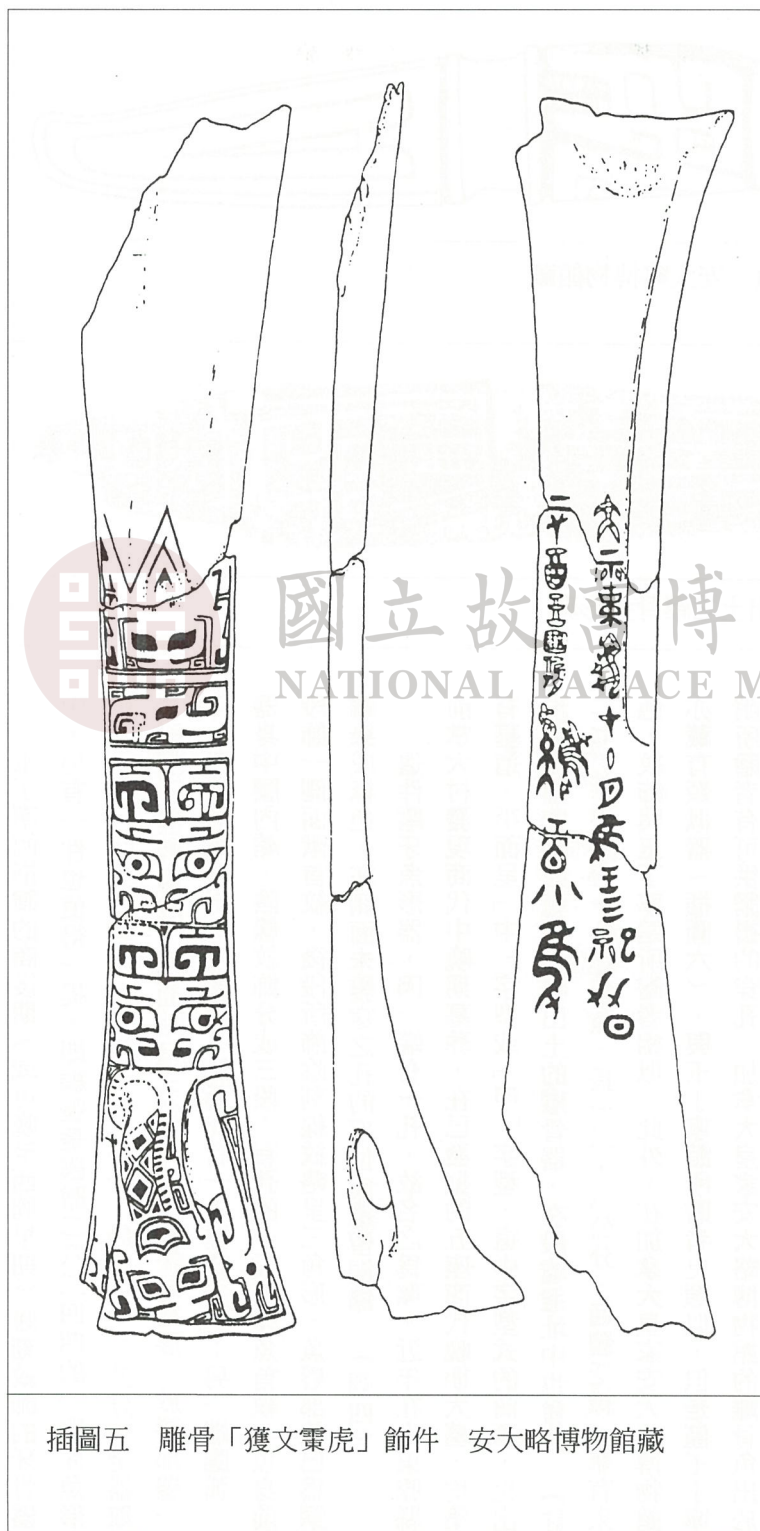
這件骨器即以器背銘文深受世人重視，並名之為「獲文靈虎」。【註二六】但是本文略去銘文，將重點移至這件骨器正面的雕刻紋飾。在玉丁寧館捐贈的牙骨器中，有一件「雕骨獸面紋飾件」，編號是國贈二八三四三，長一〇·六公分，磋磨一

【註二三】：同前註，頁三至六。

【註二四】：William Charles White 懷履光，*Bon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Toronto: The Royal Oriental Museum of Archaeology, 1945), pp. 96-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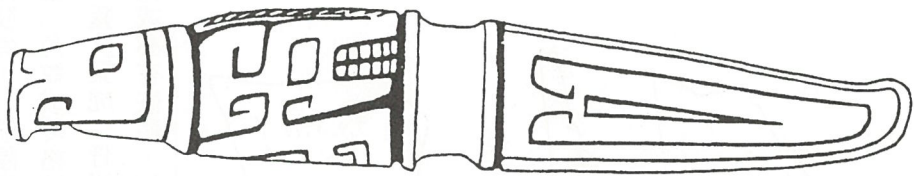
【註二五】：姚孝遂主編，《殷墟甲股刻辭類纂》（北京，中華，一九八九年一月），頁一二二四。

【註二六】：例如：李圃選注，《甲骨文選注》，第三十六件，頁一九五至一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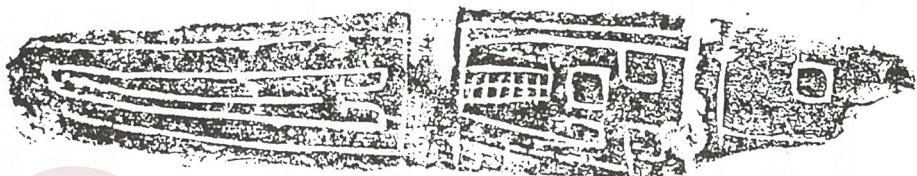


插圖五 雕骨「獲文震虎」飾件 安大略博物館藏

段肢骨，一端陰刻獸面紋，另一端又刻一側身龍紋，尾端與獸面紋交接，三臣字眼紋皆圓凹；突起面刻正面龍紋，雙眼與身軀三角紋或菱格紋中央凹陷。玉丁寧館捐贈的這件「雕骨獸面紋飾件」與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編號之B 六二五一的著名「獲文震虎」骨器正面最下方紋飾相似，前者或因殘損，首尾皆被修磨。後者局部尚留存原鑲嵌的綠松石，前者紋飾凹陷處原或亦有嵌件，如今已佚失。（圖三）



插圖六 雕骨魚 安大略博物館藏



插圖七 辛村出土之雕骨魚形珮

玉丁寧館捐贈的商後期（或可晚至西周早期）雕刻紋飾的牙骨器中，另有一件也值得一提，即編號是國贈二八三四四的「雕牙魚形珮」，長一四·一公分，最寬二·二公分，最厚一·二公分。全器取一段獸牙磋製而成，剖面略呈三角形，一端作魚首形，於唇部鑿一孔，自其下頷穿出，可繫掛，側面尚有一未鑿穿之孔；另一端圓弧。器身中腰內縮，陰線紋飾分成三段：有孔的一段即作魚首紋，魚身前段飾一側面獸首紋，後段所飾陰刻線紋略呈三角形。魚唇部位已為銅鏽染成綠色，在側面未鑿穿之孔的部位尚遺留銅鏽。（圖四）

這件雕牙魚形器，因一端有一孔，故名之為珮。近年在山東滕縣前掌大村發現商代中晚期墓葬，在已發掘的五座商代晚期大墓，均築有墓道，平面呈「中」字型或「甲」字型，這中字型式的商墓，也出現在河南安陽殷墟，墓內出土的雕骨器，在殷墟遺址中也曾見。【註二七】其中即有一件雕骨魚，長一二·六公分，通體泛綠，兼有朱色，紋飾與玉丁寧館所贈者相似。此外，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亦藏有類似器（插圖六），與玉丁寧館所贈者更類似，但是僅玉丁寧館所贈者有可供繫掛的穿孔。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的雕骨魚出於河南，山東滕縣前掌大商代大墓是「商代某方國的貴族墓地」【註二八】，也被認為是商代在東方的「商文化亞區」。【註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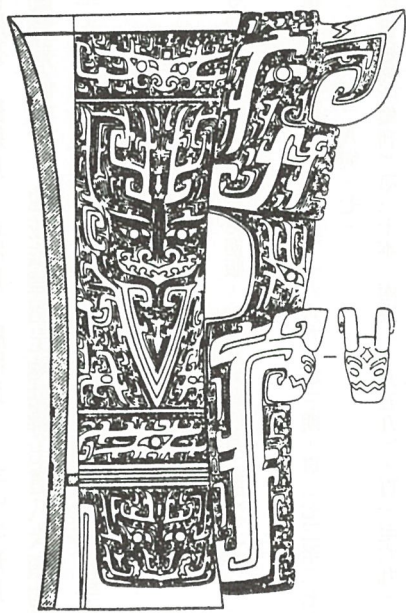
除了商代後期的出土雕骨魚外，在河南濬縣辛村E區第四條探溝一個西周早期小型墓（M七二）中，也曾出土一件雕骨魚形珮，尺寸

與玉丁寧館所贈者接近（長一四·五公分），器形與紋飾也雷同。前者魚唇部位略殘，似原有穿，故郭寶鈞逕名之爲「魚形佩系」。（插圖七）【註三〇】

因此，玉丁寧館所捐贈的這兩件雕刻紋飾的牙骨器，主要流行時間是商後期，但是不能排除其曾在西周初期短暫出現過。至於其功能，有穿孔者可供繫掛，故郭寶鈞推測：「似係縛于佩帶物上，用以插入腰帶中以防脫落者。」【註三一】懷履光對於其所見沒有穿孔的雕骨魚，則推測爲

馬鐮。【註三二】雖然二位學者的推測頗有可以商榷之處，不過玉丁寧館所贈者有穿孔，仍爲珮飾爲宜。

商後期雕刻紋飾的牙骨器中，以出土於殷墟婦好墓中的三件雕象牙杯最爲精美，兩件是夔盞，一件是虎盞，皆滿飾獸面紋、鳳鳥紋、夔紋等，並以雲雷紋襯地，夔盞杯紋飾寬凹處尙嵌黏綠松石爲飾。【註三三】（插圖八）的確是商代牙骨雕刻藝術的極致。其實在安陽殷墟的一些商代晚期墓葬，特別是大、中型墓中，往往發現用象牙製作的容器，但是這種容器一般



插圖八 婦好墓出土之象牙杯之一

【註二七】：〈滕縣前掌大商代墓葬〉，《中國考古學年鑑·一九八六》（北京，文物，一九八八年三月），頁一三七、一三八。

【註二八】：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考古精華》，頁一六八。

【註二九】：宋新潮，《殷商文化區域研究》（西安，山西人民，一九九一年十月），第二章，頁七五至八〇。

【註三〇】：郭寶鈞，《濬縣辛村》（北京，科學，一九六四），頁二三、六八、七三與圖版壹零肆：3。

【註三一】：同前書，頁六八。

【註三二】：William Charles White 懷履光，*Bon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P. 39。

保存都不好，大都被壓成碎片，或一層層剝裂，再加上盜擾或技術上處理不當，幾乎沒有一件能夠復原，似婦好墓出土的象牙杯得以修復，實屬不易。【註三四】

從婦好墓的這三件雕象牙杯可知商代後期牙骨雕刻藝術確已達到空前的成就，不但當時工匠已能熟練地掌握刻刀，在牙骨質材上陰刻紋飾，而且往往鑲嵌綠松石等彩石，以期增加作品的美觀。玉丁寧館捐贈的「雕骨獸面紋飾件」與「雕牙魚形珮」，尺寸雖然不大，卻可彌補院藏之闕，作為商代（至西周初期）牙骨雕刻藝術的註腳。

商代後期雖然是銅器藝術的燦爛時期，銅器也有排斥骨器的情形，但是因為銅工具的使用，骨器的製造量反而增加了，而且因為銅工具的使用，也提高了骨器的質量，例如骨錐，過去或對使用的刃部加工，此時在不使用的部分也加工；骨筭，過去磨製成光滑的圓頭已感滿足，此時匠心用於筭首，而出現不同的裝飾。【註三五】關於商代後期的筭，民國四十七年、四十八年（一九五八、一九五九）間考古學家李濟最早加以研究，他選出當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的骨筭標本三百八十八件，其中三十四件無出土記錄，計小屯出土者二百五十八件、侯家莊西北岡出土者八十六件、王裕口出土者五件、大司空出土者五件。根據筭首的不同，李濟分成八大類：樸狀頂、劃紋頂、蓋狀頂、牌狀頂、「羊」字形頂、幾何形頂、鳥形頂與其他動物形頂（頂部雕成動物形或以大眼為中心之動物形圖案），他並依據出土地點排出這八大類的演變層序。【註三六】其中，鳥形頂者又分為甲、乙、丙、丁、戊、己六型，己型（高座鳥型）中又有五種類別，在殷商早期即已出現，沿用到殷商晚期，殷商末期則未見。【註三七】

【註三三】：中國社會科學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婦好墓》（北京，文物，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初版，一九八六年四月二版），頁二五至二八，彩版三九、四〇。

【註三四】：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技術室，《婦好墓出土象牙杯的現場保護和修復》，《考古》一九八九年第三期，頁二七三至二七五。

【註三五】：虞愚，《商代的骨器製造》，《文物》一九五八年第十期，頁二六至二八與三七。

【註三六】：李濟，《筭形八類及其文飾之演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本（南港，一九五九），頁一至六九。

【註三七】：同前註，頁六八，圖版壹肆。

李濟所提出，出現於殷商早期的「羊」字形頂與社會階層或有關係的論點，因婦好墓的出土得到證實。婦好墓中出土了四百九十九件的骨筭，並未見「羊」字形頂者。【註三八】李濟限於當時已知的資料，認為鳥形頂者在殷商末期未見，並提出其中戊型（平頂鳥型）中的寫實鳥體為早期作品（插圖九），似乎可與「黑陶時代」銜接。同時還指出己型是戊型的第二級，出現時間比較晚。【註三九】然而近年有學者未曾仔細對比李濟的圖與文，而就圖像逕認為帶有高座的己型也是寫實鳥型骨筭，又依據陝西西安澧西張家坡西周遺址也曾出土高座鳥首筭，修訂李濟的對商代骨筭的分期順序。【註四〇】



插圖九
殷墟出土
之骨筭



插圖一〇
張家坡出土
之骨筭

以近年來的新出土資料，李濟的分期確有某種程度的修正與補充之必要。例如：未經盜擾的婦好墓曾出土四百九十九件骨筭，依據筭首的不同可分成七式，但是不見帶座鳥首筭。【註四一】位於陝西西安澧河西岸的張家坡所發掘西周墓葬，出土的筭總數在七百件以上，絕大部分是骨製，也有用象牙和鹿角製成者，所出土帶高座的鳥首筭有十件，「鳥的眼睛和胸部都鑲嵌著綠松石」。【註四二】（插圖一〇）近年來學者加入新出土的資料，重新將殷墟的骨筭依據筭首的變化分成十一類，

【註三八】：屈志仁 (James C.Y. Wat), "Pre-Ming Ivory Carving," *Chinese Ivory from Shang to the Qing* (London: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84), p. 18.

【註三九】：李濟，〈筭形八類及其文飾之演變〉，頁五七。

【註四〇】：林業強，〈商至元代的出土牙骨器〉，《關氏所藏中國牙雕》（香港，中大，一九九〇年七月），頁二一。

【註四一】：中國社會科學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婦好墓〉，頁二〇八至二一三。

【註四二】：中國社會科學考古研究所編著，〈澧西發掘報告〉（北京，文物，一九六二年），頁一〇六至一〇七，圖版伍玖。

李濟所劃分的戊型與己型合併爲象徵鳥體形，在殷墟早期即已出現。【註四三】

關於殷墟分期問題學界尚未有一致的論點，此處暫不予討論。就李濟所發表者，高座鳥首筭只出土於河南安陽西北岡，其中大墓曾出土這類骨筭的墓葬次序是：M一五五〇、M一〇〇四、M一〇〇二、M一〇〇三、M一五〇〇、M一二一七，並認爲M一五五〇與M一〇〇四屬於殷商早期偏晚至中期偏早階段；鄒衡在進行殷墟分期研究時，將此二墓歸爲第三期，相當於廩辛、康丁、武乙和文丁時期。第二期則是武丁、祖庚、祖甲時期。【註四四】無論如何，西北岡出土的高座鳥首筭的大墓是武丁之後的墓葬，婦好墓中也不見這類型筭，故而高座鳥首筭應在婦好墓主人入葬之後才出現，一直流行至西周。

玉丁寧館捐贈的商周牙骨器中，除了「雕骨獸面紋飾件」與「雕牙魚形珮」因爲雕刻紋飾而受到矚目外，另有兩件雕象牙筭，因飾高座鳥首而相當難得。一件編號是國贈二八三三三，全器長二四·二公分，乃用一整塊象牙雕製而成；筭首雕一高冠側面鳥立於王字臺座上，鑿一小凹槽做眼紋，翼部陰刻雙圈一點之圈點紋，尾上翹，近尾部亦鑿一小凹槽，凡凹槽內原或有綠松石等嵌件，今已佚，有三處凹槽填塞土質；喙突勾；筭身剖面呈橢圓形，尾端圓鈍。全器多處沾黏沙土，但仍露出象牙黃色。（圖五）另一件編號是國贈二八三五四，全器長一二·四公分，也用一整塊象牙雕製而成；筭首所雕立於王字臺座上高冠側面鳥，尾部鑿凹槽，而且臺座部位有傷缺，筭身呈扁圓柱形，尾端扁尖，或即因殘損，修磨後呈扁尖。此器已呈象牙黃色，應已出土了一段時間，可謂傳世器。凹槽內原或亦嵌有綠松石類飾件，今已佚。（圖六）依據前文所述，這兩件「雕象牙鳥首筭」應爲商代後期武丁之後，或晚至西周時的製品。

另有一件「雕骨鳥首筭」，編號是國贈二八三五五，全長一二·二公分，器用一整塊骨雕製而成；筭首雕重疊的側面雙

【註四三】：中國社會科學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的發現與研究》（北京，科學，一九九四年九月），頁三八三至四〇三，有關殷墟出土的骨角牙器由陳志達撰寫。

【註四四】：鄒衡，《試論殷墟文化分期》，《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一九六四年，第四、五期。又見同氏《夏商周考古論文集》（北京，文物，一九八〇年），頁七六至八二。

鳥立於王字臺座上，陰刻一點做眼紋，翼部陰刻雙圈一點之圈點紋，鳥眼、胸部與臺座上原或皆嵌綠松石為飾，部分嵌件已佚；臺座與鳥尾部位有傷缺，筭身呈扁圓柱形，尾端呈銳尖錐形。（圖七）這件骨筭首部下層鳥尾與王字臺座殘損，上層鳥尾和喙部以及下層鳥喙和胸部皆有修磨痕跡，筭身尾端因斷缺而磨成尖錐狀。就目前已發表的資料而言，商代晚期尚未見筭首雕刻成重疊雙鳥者，倒是在澧西張家坡西周居址中曾出現「頂端雕刻成重疊的雙鳥」之高座鳥首骨筭（編號H四一三：一：一八），鳥的眼睛與胸部也鑲嵌著綠松石。【註四五】因此，玉丁寧館捐贈的這件骨筭或也是西周遺物。

就目前的資料而言，商代後期的骨器中，鏃的數量最多，筭的數量僅次於鏃。【註四六】不論是殷墟或西周遺址，皆曾發掘製骨作坊。殷墟所發掘者一處在大司空村遺址，範圍較大，另一處在北辛莊遺址，出現較晚；所發現的骨料有牛、馬、豬、狗、羊、鹿與鹿角等，兩處皆發現石製與銅製製骨工具，根據遺物判斷，兩個作坊都以生產骨筭為主。由於二處是以生產骨筭為主的製骨作坊，「說明當時已發生了直接以交換為目的的生產，即商品生產」。又因為殷墟出土骨料的地點不限於製造骨器的作坊遺址，推測當時「除有專門從事製造骨器的作坊外，也有零星的家庭生產。」【註四七】其實在更早的河南鄭州商城北城牆外即曾發現製骨作坊，為製骨筭與骨鏃的地點，所發現的骨料除了牛骨、豬骨與鹿角之外，半數以上是人的肢骨和肋骨。【註四八】

西周遺址中，在陝西西安澧西新旺村與扶風雲塘村皆曾發現製造骨器的作坊，依據出土骨料分析，澧西新旺村的製骨作坊所用的骨料以牛骨為主，也有不少鹿骨，兼及鹿角，是一處西周晚期製造骨筭與骨鏃的專業作坊。【註四九】扶風雲塘村是「周原」、「岐邑」之地，製骨作坊遺址屬西周中期至晚期，西周中期是發展極盛時期，在遺址中出土的骨製產品中，骨

【註四五】：中國社會科學考古研究所編著，《澧西發掘報告》，頁一〇六，圖版伍玖：一。

【註四六】：中國社會科學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的發現與研究》，頁三八九與三九一。

【註四七】：中國社會科學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發掘報告（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北京，文物，一九八七年十一月），頁七九至八九與二八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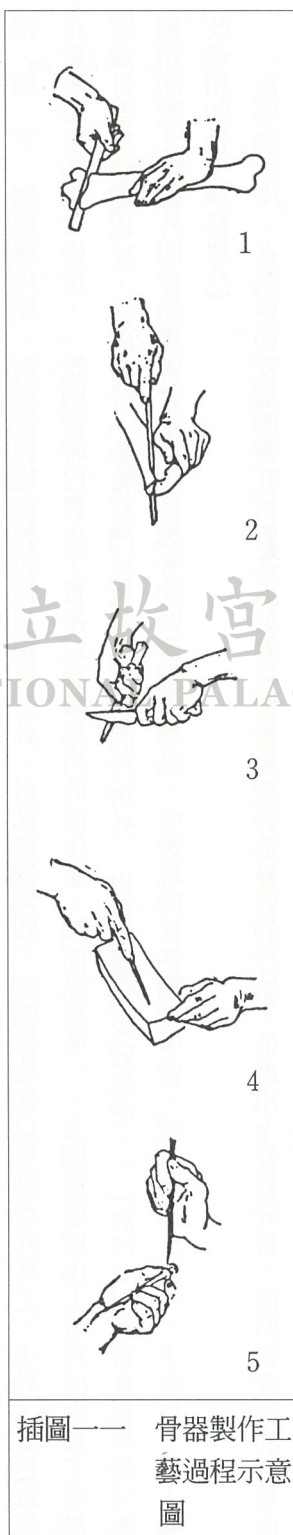
【註四八】：楊育彬，《河南考古》（中州古籍，一九八五年十月），頁一〇四、一〇五。

【註四九】：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澧西工作隊，《陝西長安縣澧西新旺村西周製骨作坊遺址》，《考古》一九九二年第二期，頁九九七至一〇〇三。

筭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其次是骨錐、骨針等製品。從雲塘村製骨作坊遺址所出土的廢骨料以獸類骨骼的關節部位為多，可見得當時以獸類的四肢骨為主要原料，也以牛骨最多，另有馬、羊、豬、狗、鹿和駱駝的骨骼。【註五〇】

澧西新旺村製骨作坊遺址中未曾發現製骨工具，但是在扶風雲塘村的製骨作坊曾出土銅鋸、銅刀、銅鑽和礪石等製骨工具，以骨筭為例，考古工作者推測當時製骨工序是選材、鋸割、削銼、打磨、雕嵌等。【註五一】（插圖一一）

商周時代骨器以骨鏃與骨筭最多，玉丁寧館捐贈的牙骨器中，除了前述三件鳥首筭外，也有骨鏃兩件，牙骨筭四件，後者筭首或圓弧或平頂，【註五二】雖然樸實，卻可供瞭解當時這兩類器物的製作工藝。



商代後期婦好墓出土的象牙杯是當時牙骨工藝的極致，其紋飾風格與當時銅器上的紋飾並無二致，在陝西西安張家坡西周井叔墓中曾出土一件象牙杖首，雕刻成虎頭狀，口、鼻、眉、眼、耳等都刻成細槽，槽內鑲嵌綠松石片，頸部也鑲二周綠松石裝飾。【註五三】

【註五〇】：陝西周原考古隊，〈扶風雲塘西周骨器製造作坊遺址試掘簡報〉，《文物》一九八〇年第四期，頁二七至三五。

【註五一】：同前註，頁三三、三四。

【註五二】：嵇若昕，〈玉丁寧館捐贈牙骨竹木雕器目錄〉（台北，故宮，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頁十二至十四與頁二二、二三。

除了延續商代後期的牙骨工藝外，西周仍有所新創，此時雖然仍出現在骨器上雕刻紋飾的情形，但是在西周玉器上所常見的側身人面紋，骨器上也出現。此外，當時童子在成年之禮後佩觿，此時也見骨製，車馬器中的骨角製飾件更多。【註五四】例如出土於陝西寶雞茹家莊西周中期強伯之妻井姬墓（二號墓）中的鹿角製成的鑲具，即是一件車馬器。【註五五】強伯墓（一號墓）與豐西西周遺址中出土的骨細腰（也有學者稱「節約」、「骨紐」等名稱），也是一種車馬器。【註五六】類似的骨細腰在其他西周遺址或墓葬中也曾發現。【註五七】除此之外，在陝西西安張家坡井叔墓中也曾出土象牙杯，乃採用一段中空的象牙作杯筒，可能另加木底為器底，有髹塗紅漆的遺痕，因為「在杯底上下的填土中夾有很清晰的一層紅漆」，但是器表並無紋飾，以展現象牙的本質。【註五八】

玉丁寧館捐贈文物中有兩件角製的觿，皆作仿人面紋飾，目前僅定為周代文物。【註五九】在西周玉器中常見人紋璜，也曾見人紋玉觿，這兩件角觿的人紋與玉器上的人紋並不一樣，但是流行時間或與其相當。此外，尚有四件牙、骨細腰，有的因在地下與銅器長時間接觸，已呈深綠色，在斷代工作上，宜訂為周代之物。【註六〇】

第三節 東周與漢代

【註五三】：中國社會科學考古研究所灋西發掘隊，〈陝西長安張家坡M一七〇井叔墓發掘簡報〉，《考古》一九九〇年第六期，頁五〇四至五一〇。

【註五四】：郭寶鈞，〈濬縣辛村〉，頁六八，圖版伍肆：5、6。

【註五五】：盧連成、胡智生，〈寶雞強國墓地〉（北京，文物，一九八八年十月），頁三八三。

【註五六】：同前書，頁三五七。

中國社會科學考古研究所編著，〈灋西發掘報告〉，頁一一〇。

【註五七】：德州地區文化局、濟陽縣圖書館，〈山東濟陽劉台子西周墓地第二次發掘〉，《文物》一九八五年第十二期，頁一五至二〇。

北京大學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一九九二年春天馬一曲村遺址墓葬發掘報告〉，《文物》一九九三年第三期，頁一至三五。

【註五八】：中國社會科學考古研究所灋西發掘隊，〈陝西長安張家坡M一七〇井叔墓發掘簡報〉，頁五〇九。

【註五九】：嵇若昕，〈玉丁寧館捐贈牙骨竹木雕器目錄〉，頁一八、一九、二二五、二二六。

春秋戰國時期，戰爭頻仍，不論車戰或馬戰，車馬器的需要量都更大，與銅、玉製品相較，牙、骨、角質材更顯得價廉易得，故而此時用牙、骨、角所製的車馬器似有增加的趨勢，鑣具、細腰、環、管等牙、骨、角製車馬器一再出現【註六一】。除此之外，春秋戰國時期，君子佩玉儼然成風，玉珮藝術達登峰之境，相形之下，牙、骨、角質飾件也得到長足發展。

雖然在史前即已見由骨珠、骨管等組成的成串牙骨串飾的端倪，【註六二】降及西周，成串牙骨串飾一再出現【註六三】，東周時仍經常得見，例如河北平山春秋墓葬【註六四】、山東曲阜魯故城戰國早期墓葬（M二，M五八）【註六五】、河北平山中山國王陵一號陪葬墓【註六六】曾出土骨質串珠，至於出土時零星散亂的骨珠也相當多，在湖北隨縣擂鼓墩出土的曾侯

【註六〇】：同前書，頁二一、二二六與二二七。

【註六一】：例如山東曲阜魯故城西北角春秋墓葬中曾出土骨鑣與骨細腰。見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省博物館、濟寧地區文物組、曲阜縣文管會，《曲阜魯故城》（濟南、齊魯書社，一九八二年九月），頁一一〇。

洛陽春秋中期墓葬曾出土骨鑣，見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兩座東周銅器墓》，《中原文物》（洛陽，河南省博物館）一九八三年第四期，總二六期，頁一七。

戰國遺址或墓葬中出土的車馬器俯拾即是。例如：

河南輝縣琉璃閣戰國墓葬曾出土骨鑣。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輝縣發掘報告》（北京，科學，一九五六），頁四四、四五。

湖北隨縣戰國初期曾侯乙墓出土三十七對骨角質馬鑣，這些鑣具通身髹褐色漆，黑漆繪波浪紋或三角紋，甚至是先陰刻後再描黑漆。此外，同墓尚出二十件鑣形骨角器。見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北京，文物，一九八九年），頁三二六、三二七。

河北平山戰國中後期中山國墓出土的骨細腰、骨管、三尖頭骨管、骨片等車馬器，為數甚夥，但是並未見鑣具，而是用環形器固定。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響墓——戰國中山國王之墓》（北京，文物，一九九五年二月），頁三〇五至三二七。

【註六二】：例如北京東胡林村的新石器時代墓葬中即曾出土由七枚扁狀骨管串成的骨鑣，係由牛的肋骨截斷磨製而成。見周國興、尤玉柱，《北京東胡林村的新石器時代墓葬》，《考古》一九七二年第六期，頁一二至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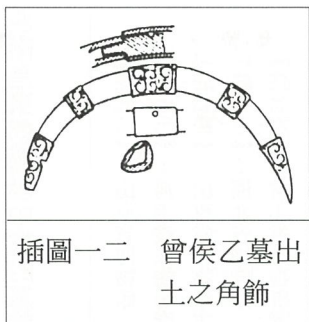
【註六三】：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省博物館、濟寧地區文物組、曲阜縣文管會，《曲阜魯故城》，頁一八一與圖版壹柒。

【註六四】：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平山三汲古城調查與墓葬發掘》，《考古學集刊》（北京，科學）一九八七年第五期，頁一七七與圖版拾玖：五。

【註六五】：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省博物館、濟寧地區文物組、曲阜縣文管會，《曲阜魯故城》，頁一八一與圖版壹玖。

乙墓中即有不止一顆的骨珠，或呈圓珠形，或呈璧形，或呈長條管形。【註六七】

春秋戰國時期這些牙、骨、角質的飾件與車馬器，與當時玉器、銅器的同類器相似，但也曾有因質材的不同而具備的獨立性；例如曾侯乙墓所出土的角飾，其所飾鉤雲紋與玉器上者相近，但器形突出的「節」，則較少見。【註六八】（插圖一二）至於玉器中的紐絲紋，骨器也不乏其例；例如在河南汲縣山彪鎮第五號戰國墓出土的一件紐絲紋骨環，出土時即伴隨一件鐵帶鉤，當時這件骨環或即與這件鐵帶鉤一起搭配使用。【註六九】



由於戰爭的頻仍，服御的改變，春秋戰國時的帶鉤，除了常見的銅質、鐵質與玉質外，也有金、石、骨、角、木、陶與琉璃質者，木、陶與琉璃質帶鉤或應排除於實用器之外。這類帶鉤的始作期約在春秋中期至戰國早期，戰國中期至戰國晚期達於鼎盛。見於報導的骨、角質帶鉤幾乎都是戰國時代之物，紋飾多是陰刻葉片紋和對三角紋，兼有圈點紋，另外尚有鑲嵌彩石為飾者。

【註七〇】

紋飾的表現技法上，除了鑲嵌、陰刻或陽雕外，東周牙骨角器上的紋飾也出現彩繪、鑲嵌金絲與烙印者。在安徽壽縣春秋晚期蔡侯墓中出土的角鐮，「較完整的尚烙有花文」。【註七一】山

東臨淄一座春秋末期陪葬坑中，出土不少牙骨管，其中有一喇叭狀骨管，器表即鑲嵌金絲為飾，考古工作者借用銅器金銀錯之名，稱之為「錯金骨飾」【註七二】；若以牙骨質材，稱之為「嵌金絲」或者更合適。至於彩繪紋飾的實例，則數見不鮮，

【註六六】：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聲墓 戰國中山國國王之墓》，頁四五八與圖版二五九。

【註六七】：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頁四三四。

【註六八】：同前書，頁四三一至四三四。

【註六九】：郭寶鈞，《山彪鎮與琉璃閣》（北京，科學，一九五九年九月），頁二〇。

【註七〇】：王仁湘，《帶鉤概論》，《考古學報》一九八五年第三期，頁二六七至三一二。

【註七一】：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安徽省博物館，《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北京，文物，一九五六年十二月），頁一六。

諸如河南浙川下寺春秋晚期楚墓(M一一)中曾出土兩件器表黑繪雲雷紋的骨鑲【註七三】，山東曲阜魯故城戰國早期墓(M五一)曾出土牙管彩繪鉤雲紋【註七四】，曾侯乙墓出土的骨角質鑲貝上髹漆彩繪波浪紋、三角紋或帶紋等紋飾【註七五】，中山國王墓中也曾出土赭色雲紋骨管、骨片與車馬器中的衡帽(也稱衡末)【註七六】，屬於戰國晚期的湖北包山五號墓出土的骨飾件器外壁「兩端以黑彩各繪一平行線，中部繪二方連續三角雲紋間以太陽紋」【註七七】。

秦代國祚短暫，牙骨器的使用未曾中衰。【註七八】進入漢代，不論陶器、漆器、玉器等工藝皆在戰國時代的輝煌基礎上有所發展，牙骨器亦不例外。

漢代牙骨器在紋飾的製作上，陰線雕刻、浮雕、彩繪的作品仍然可見。浮雕紋飾往往模仿當時玉器紋飾【註七九】，而以徐州北洞山西漢墓中出土的一件骨製轆形珮，鏤空雕刻六隻蟠繞曲折的螭紋，為當時骨雕藝術的代表。【註八〇】另在江西南昌東郊西漢中期的墓葬中，曾出土模仿玉器上以穀紋作為器表裝飾的象牙璧，以及模仿漢代玉舞人的象牙舞人劍飾。【註

【註七二】：山東省博物館，〈臨淄郎家莊一號東周殉人墓〉，《考古學報》一九七七年第一期，頁七三至一〇四。

【註七三】：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浙川縣博物館，〈浙川下寺春秋楚墓〉（北京，文物，一九九一年十月），頁三〇七。

【註七四】：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省博物館、濟寧地區文物組、曲阜縣文管會，〈曲阜魯故城〉，頁一八〇一與一八一。

【註七五】：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頁三二六、三二七。

【註七六】：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響墓——戰國中山國王之墓〉，頁二四八、二四九、三一五、三一六與三二七等。

【註七七】：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北京，文物，一九九一年十月），頁三二七。

【註七八】：例如：秦始皇陵兵馬俑坑中曾出土骨管、骨片與骨鉤等骨飾品，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發掘隊，〈秦始皇陵兵馬俑坑——一號坑發掘報告（一九七四—一九八四）〉（北京，文物，一九八八年十月），頁二四一至二四三。

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中曾出土骨製六博棋子，見孝感地區第二期亦工亦農文物考古訓練班，〈湖北雲夢睡虎地第十一號秦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六年第六期，頁一至一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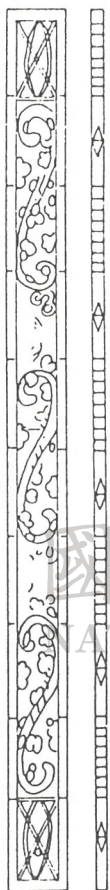
【註七九】：林業強，〈商至元代的出土牙骨器〉，頁二五。

【註八〇】：徐州博物館、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徐州北洞山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八八年第二期，頁一七，圖版參：五、六。

八二】此外，漢代也曾以浮雕技法模仿銅器上的紋飾。【註八二】漢代的彩繪陶器和磚畫上常有鮮豔、美麗的紋飾，筆調輕盈，線條流暢，深具律動感。此時牙骨器上的彩繪風格也不例外，雖然彩繪顏色容易剝落，但也不乏出土例證。除了八〇年代末期以爲的「僅見的標本」【註八三】——寧夏固原東漢墓出土的彩繪骨尺【註八四】，尚有薨於西漢元帝初元四年（西元前四十五年）廣陽頃王劉建的墓中所出的彩繪骨棒，或河南省盧氏縣城關鎮東漢磚室墓出土的彩繪骨尺等等。彩繪骨棒長一一·七公分，直徑〇·七公分，通體繪五組三角紋與直線紋，其中三組朱繪三角紋和白色線紋，另二組紋飾均爲白色。【註八五】（插圖一三）盧氏縣出土的彩繪骨尺長二三·二公分，寬一·七公分，厚〇·三—〇·四公分，略呈彎曲，兩面除用墨色畫出十寸度數外，兩端各一寸處另繪飾網紋，中間飾三組雲紋，紋飾除墨色勾輪廓外，又填染紅、綠色。側壁除墨畫度數外，尚繪菱形符號。【註八六】（插圖一四）



插圖一三 西漢晚期 北京大葆台廣陽頃王墓出土之彩繪骨棒



插圖一四 盧氏縣東漢墓出土之彩繪骨尺

漢代牙骨器上的陰刻紋飾，最常見的即是圈點紋，或單圈，或雙圈，近人以爲「這種簡單的花紋或是源自玉雕中的蒲穀紋」，【註八七】但是在商代晚期的牙骨鳥首筭的翼部，即以圈點紋爲飾者，春秋骨片上也曾刻飾小圈點紋【註八八】，戰國骨質帶鉤上常飾以圈點紋，戰國末期至漢代的牙骨器上，如珠、環、籌、佩飾、

【註八一】：江西省博物館，〈南昌東郊西漢墓〉（《考古學報》一九七六年第二期，頁一七一至一八六）。

【註八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滿城漢墓發掘報告〉（北京，文物，一九八〇年），頁三三三至三三五，圖二二六。

【註八三】：林業強，〈商至元代的出土牙骨器〉，頁二五。

尺、筭等等，皆常飾以圈點紋【註八九】。雖然如此，藝匠運用圈點紋作為牙骨器中動物的眼紋或圓雕作品的裝飾文樣，一直延續至明末清代，【註九〇】但仍以戰國末期至漢代的牙骨器上使用圈點紋的情形較為常見。

除了圈點紋與一般陰刻紋飾【註九一】外，漢代牙骨器上更纖細的陰線針刻紋飾，則與當時漆器上的針刻紋飾並駕齊驅，也以流暢為勝。漢代墓葬出土牙骨器上陰線針刻紋飾的實例相當多，例如河北平山中山靖王妃寶綰墓中出土的一件牙勺，表面陰線針刻流雲紋（插圖一五），中山靖王劉勝墓中出土雕牙六博棋子，殘存的三面陰線針刻虎紋，或伏臥，或行走（插圖一六）；【註九二】同屬西漢初期的廣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金釧牙卮，象牙部分滿佈陰線針刻紋飾，主紋飾大小略異的神獸紋，紋飾陰線內還填染朱、藍色料（插圖一七）；【註九三】遼寧朝陽漢代遺址出土的骨片上陰線針刻花葉紋，並塗了紅色顏料，「是一件藝術品」（插圖一八）；【註九四】北京大葆台西漢晚期廣陽頃王劉建墓出土的鳳紋殘骨雕，正面飾飛舞丹鳳，

【註八四】：國家計量總局主編，邱隆、丘光明、顧懋森、劉東瑞、巫鴻編，《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北京，文物，一九八一年十月），圖版二一。

【註八五】：大葆台漢墓發掘組，《北京大葆台漢墓》（北京，文物，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頁五〇、五一。

【註八六】：牛樹森、牛愛國，《河南省盧氏縣出土一件東漢彩繪骨尺》，《文物》一九九二年第七期，頁八〇。

【註八七】：林業強，《商至元代的出土牙骨器》，頁二五。

【註八八】：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鑄銅遺址》（北京，文物，一九九三年十一月），頁四二二、四二三。

【註八九】：林業強，《商至元代的出土牙骨器》，頁二五。

【註九〇】：《關氏所藏中國牙雕》，頁一四六、一四七，圖四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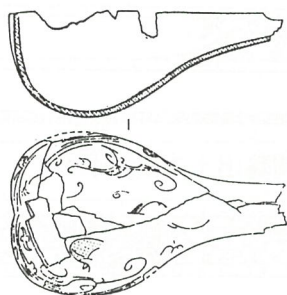
Chinese Ivory from Shang to the Qing, p. 181.

【註九一】：大葆台漢墓發掘組，《北京大葆台漢墓》頁五三中發表的雕牙六博棋子上的飛龍與奔虎紋飾即可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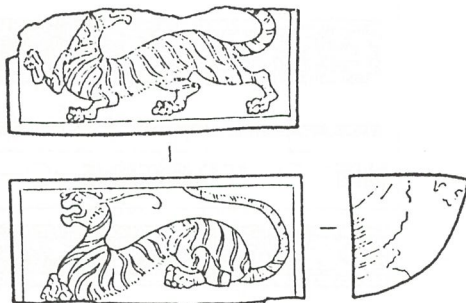
【註九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滿城漢墓發掘報告》，頁二一四、三三三與圖版一五三；一、二、圖版二三四：二。

【註九三】：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博物館，《西漢南越王墓》（北京，文物，一九九一年十月），頁一三九、一四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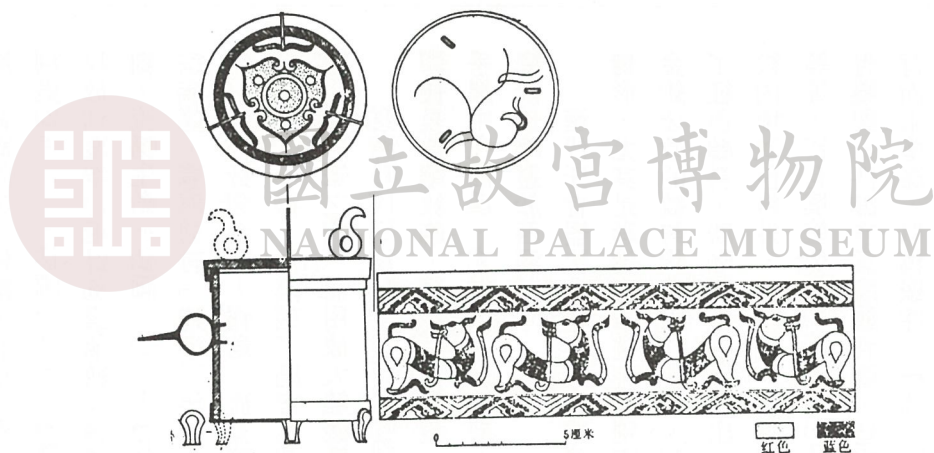
【註九四】：高青山，《朝陽袁台子漢代遺址發掘報告》，《遼海文物學刊》（瀋陽，遼寧省博物館）一九八七年第一期，頁三七、三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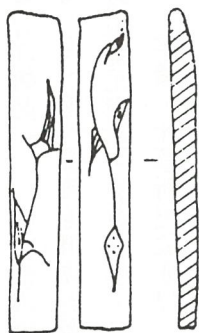
插圖一五 西漢初期 河北平山中山靖王墓出土之牙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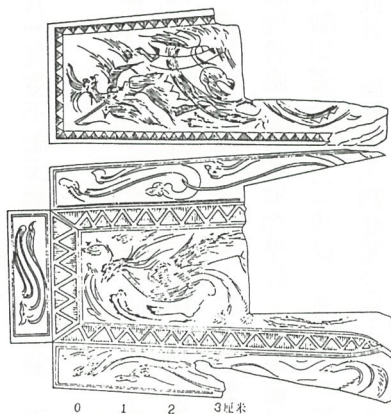
插圖一六 西漢初期 河北平山中山靖王墓出土之雕牙虎紋六博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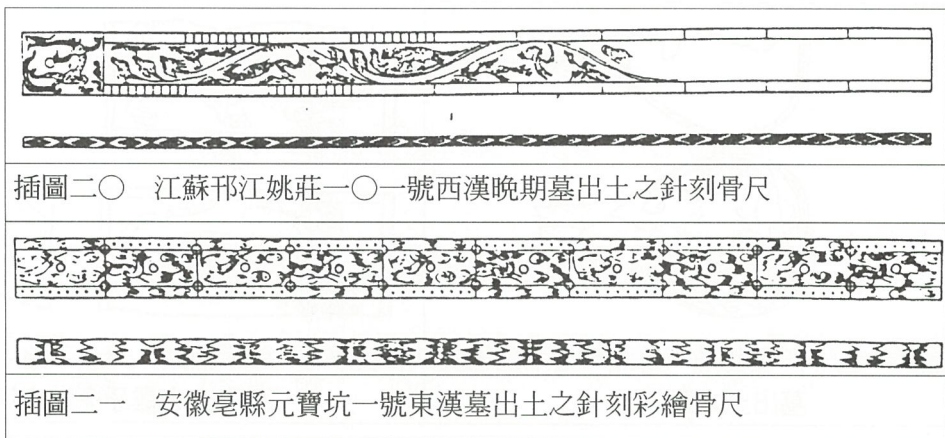
插圖一七 西漢初期 廣州南越王墓出土之金釵針刻象牙卮



插圖一八 遼寧朝陽漢代遺址出土之骨片



插圖一九 西漢晚期 北京大葆台廣陽頃王墓出土之鳳紋殘骨雕



插圖二〇 江蘇邗江姚莊一〇一號西漢晚期墓出土之針刻骨尺

插圖二一 安徽亳縣元寶坑一號東漢墓出土之針刻彩繪骨尺

鳳，背面陰刻一怪獸，右爪高舉一鞭，下騎飛龍，側壁亦皆有紋飾，「雕工精細，陰刻處均塗紅」（插圖一九）；【註九五】江蘇邗江姚莊一〇一號西漢晚期墓中出土的骨尺於刻度空白處針刻雲氣紋，雲氣紋間刻龍、虎、羊、錦雞等飛禽走獸，紋飾線條纖細，流暢生動（插圖二〇）；【註九六】安徽亳縣元寶坑一號東漢墓，是漢末三國曹操宗族墓，墓碑刻有「建寧三年」（一七〇年）字樣，此墓所出象牙尺，側壁陰刻幾何紋，尺面針刻奔鹿、祥鳥、流雲等紋飾，紋飾填塗朱紅顏色（插圖二一）；同墓另出土一件象牙簪，也陰刻了圖案式花紋，紋飾內填塗朱綠顏色；這兩件象牙器用的陰刻紋飾的刀筆之細，需用放大鏡觀看。【註九七】

東漢時代牙骨器上的陰線針刻紋飾與西漢時期同類紋飾相較，有「退化」的現象，即便是浮雕紋飾，也有類似現象。至於模仿玉器或銅器器形與紋飾的漢代牙骨器，似乎集中在西漢，尤其是西漢初期。【註九八】其實不論玉器、漆器、銅器，兩漢相較，東漢也略遜於西漢。

漢代牙骨器紋飾製作方式雖然有陰線雕刻、浮雕、彩繪等分別，但是常見融合的情形，尤其是彩繪技法往往分別與浮雕或陰線雕刻融合。除了前述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金釧牙卮的紋飾陰線內填染朱、藍色料，遼寧朝陽漢代遺址出土的骨片針刻花葉紋塗了紅色顏料，廣陽頃王劉建墓出土的鳳紋殘骨雕「陰刻處均塗紅」等陰線針刻紋飾刻紋內填塗色料外，即便是一般陰線雕刻紋飾如圈點紋、三角紋、波浪紋、網紋、弦紋等等，皆有填塗色料的情形。【註九九】此外，廣陽頃王劉建墓還出土了一件鏤空鳳紋骨雕與一件鏤空雲龍紋骨雕，皆出於墓西面內迴廊中，雕工精細，器表皆髹塗漆料，背面未塗漆，似為嵌件。【註一〇〇】

除了嵌件、裝飾品外，漢代以牙、骨、角等質材鑿製生活用具的情形也一再出現，例如前述的牙骨尺，是當時實用器。

【註一〇二】至於漢墓出土的六博棋子與六博箸，應為休閒生活的器用。

商代後期以來，曾見以玉石、牙骨質材圓雕一些象生動物，例如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中出土五件圓雕骨蛙（長二·一—二·七公分，高〇·九—一·〇公分），四件眼部鑲嵌綠松石，器身或有小鼻穿，或有小圓穿孔，以供佩帶。【註一〇二】河南濬縣西周晚期墓中曾出土一對骨質鴛鴦筭首，器表陰刻細緻羽毛，腹下有孔，以供插入骨筭，【註一〇三】故原作簪飾，尺寸失記，從圖版看來原器應相當小。又如江蘇邗江姚莊一〇一號西漢墓曾出土瑪瑙、玉等組成的串飾，出於頸、胸部，其中有羊、鳥形飾，從圖版看來尺寸極小；【註一〇四】河北定縣東漢中山穆王劉暢墓中曾發現鳥、獸、蛙等琥珀動物，從圖版看來尺寸也甚小；【註一〇五】廣州西漢後期墓葬中曾發現琥珀獅，長僅一·八公分，寬〇·九公分，腹部有橫穿孔，【註

【註九五】：大葆台漢墓發掘組，《北京大葆台漢墓》，頁五一、五二。

【註九六】：揚州博物館，《江蘇邗江姚莊一〇一號西漢墓》，《文物》一九八八年第二期，頁四一。

【註九七】：國家計量總局主編，邱隆、丘光明、顧懋森、劉東瑞、巫鴻編，《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圖版二六。
安徽省毫縣博物館，《毫縣曹操家族墓葬》，《文物》一九七八年第八期，頁三二至四五。

【註九八】：林業強，《商至元代的出土牙骨器》，頁二五。

【註九九】：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孫家寨漢晉墓》（《文物》，一九九三年十二月），頁一六六、一六七。上孫家村在青海省西寧市大通縣后子河鄉，一東漢早、中期墓（M六九）出土一骨質鐘形飾，器表陰刻圈點紋、波浪紋、網紋和弦紋，紋飾內填塗黑色。另一漢末魏晉初年墓（M二）出土一件骨管，器表陰刻鋸齒紋、三角紋等，紋飾內也填塗黑色。

【註一〇〇】：大葆台漢墓發掘組，《北京大葆台漢墓》，頁五一、五二。

【註一〇一】：河南盧氏縣出土的東漢彩繪骨尺，經專家鑑定，即認為是東漢實用的尺。見牛樹森、牛愛國，《河南省盧氏縣出土一件東漢彩繪骨尺》。

【註一〇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頁二一四、二一五，彩圖三八：二與圖版一八三：四。

【註一〇三】：郭寶鈞，《濬縣辛村》，頁六八，圖版伍肆：二。

【註一〇四】：揚州博物館，《江蘇邗江姚莊一〇一號西漢墓》，頁四一。

一〇六】同一地區東漢前期墓中則曾發現瑪瑙獅、琥珀魚、蛙、獅等，琥珀魚、蛙、獅尚與其他質材玉、石珠穿成串飾，後者依圖版判斷，尺寸應很小，前者則公佈尺寸（長一·二公分，高〇·九公分，寬〇·六公分），這些珠飾多出於棺內中部，「原是死者身上配戴的飾品」。

【註一〇七】河北除了定縣東漢中山穆王墓中發現琥珀製象生小動物，在陽原三汾溝西漢晚期墓M九中也曾發現玻璃製的象生動物——羊與鴨，前者長一·四公分，高〇·九公分，後者長也是一·四公分，高一·一公分，兩者的腹部都橫穿一孔，羊出於棺內死者左手腕的南側，鴨則出於北側。

【註一〇八】姚莊一〇一號西漢墓出土的羊、鳥形飾腹部皆有橫穿；三汾溝訂為西漢晚期的M九所出土之玻璃羊與鴨腹部都有橫穿；東漢中山穆王劉暢墓中出土的琥珀動物，從圖版看來動物腹部多有橫穿；至於廣州東漢前期墓中出土的瑪瑙獅，報告中明白指出有圓形穿孔，根據圖版所示也是在腹部有橫穿。這些玉、石或玻璃質材製成的象生小動物不但有穿孔，尺寸又很小，有的與其他珠、管串在一起，有的出於墓主人的頸、胸部或手腕附近，或者在棺內的中部，應該都是作為串飾。漢代墓葬出土的有穿孔象生小動物以玉石製者為主

【註一〇九】，但是也曾發現用骨料碾製的小動物，例如洛陽的一座西漢晚期墓葬中即曾發現一件用骨料雕刻成的羊形動物，突出羊犄角和屈腿，刀法簡鍊，正中有一橫穿小孔，長僅一·二公分，高僅〇·九五公分，考古工作者即以爲：「帶孔的骨俑……當為裝飾品。」

【註一一〇】在貴州清鎮平壩西漢末至東漢的墓葬中也曾出土一件骨製小獅，原報告中此件骨獅的尺寸

【註一〇五】：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三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三年第十一期，頁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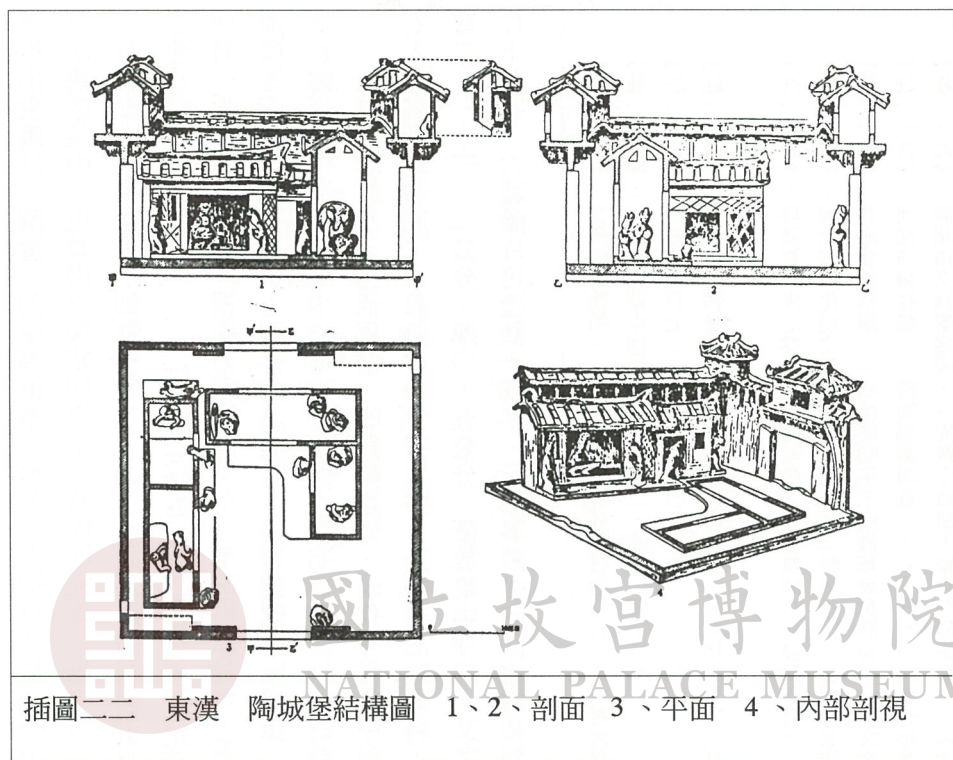
【註一〇六】：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市博物館，〈廣州漢墓〉（北京，文物，一九八一年十二月），頁二九二與圖版九〇：五。

【註一〇七】：同前書，頁三五二與圖版一一四：四、七。

【註一〇八】：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張家口地區文化局，〈河北陽原三汾溝漢墓群發掘報告〉，《文物》一九九〇年第一期，頁一至一八。

【註一〇九】：雖然在南北朝墓葬中也曾出土用煤精製成的小獅兩件，器身有二孔，一孔也橫穿於腹部，長僅二·五與三·五公分，高僅二與二·五公分，但出於四川昭化的崖墓，或為前代遺存。沈仲常，〈四川昭化寶輪鎮南北朝時期的崖墓〉，《考古學報》一九五九年第二期，頁一〇九至一二六。

【註一一〇】：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北邙飛機場九〇三號漢墓〉，《考古與文物》（西安，陝西省考古研究所）一九九七年第五期頁一七。



插圖二二 東漢 陶城堡結構圖 1、2、剖面 3、平面 4、內部剖視

失記，但繪出原寸線圖，腹部也有一橫穿，就線繪圖所測量的尺寸乃長約二·二公分，高約一·五公分。【註一一】若將前述商周與漢代的圓雕象生動物相比，漢代者雕工簡鍊多了。除了這兩件出土的漢代骨雕小動物外，傳世或流散品也不乏實例【註一二】；雖然如此，出土的骨雕者究竟不如玉石者多，或許與尺寸小，質材易朽有關，故而未引起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有穿孔的漢代牙骨圓雕象生動物多作串飾，傳世或流散品中尚見同類無穿孔的牙骨小動物，例如香港私人收藏牙骨器中即有牙骨豬。【註一三】這種無穿孔的牙骨小動物不應作串飾，漢代牙骨筭中又未曾發現以動物為端飾者，其用途為何？此時在廣州東漢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陶灶、陶車、陶屋、陶城堡明器可作借鏡，這些建築明器中皆仿當時人生活情形而佈置了一些器用、人物俑、動物俑穿插其中，但具體而微，尺寸甚小，動物中視需要出現雞、貓、狗、豬、羊等家禽或家畜，以及馬等代步用動物。【註一四】（插圖二二）其實在春秋中期至戰國中期的陝西鳳翔秦國墓葬中出土之陶牛車模型，所搭配的二件牛俑也相當簡鍊，但尺寸上大多了（長一九與二〇公分，高一三·八與一二公分）。【註一一五】在廣州西漢中期與後期墓葬中雖

然也出現陶灶、陶倉、陶屋等模型，但並未搭配尺寸微小的象生動物。至於東漢，除了廣州東漢墓葬外，例如河北望都二號東漢晚期墓中，也曾出土陶豬圈模型，其內即配置一隻小豬，就比例看來，尺寸甚小。【註一一六】此外，甘肅武威磨嘴子東漢墓曾出土木製象生小動物【註一一七】，河南省靈寶張灣東漢後期墓葬中也曾搭配陶樓、陶倉、陶豬圈、陶羊圈等出土相關象生小動物、人物【註一二八】。在安徽全椒縣一座東吳磚室墓中，曾出土一件陶製羊圈，有八公分高，九·六公分寬，其正面有一近似長方形門，裡面俯臥著兩隻羊，羊高僅四公分，長僅三公分。【註一二九】山西眉縣一座東漢末期墓葬中雖然未見陶樓等明器，但是曾出土兩件肥身尖喙，造型簡略的陶母雞，身長僅有四公分。因此，傳世所見的牙骨小動物或者也是為佈置在類似漢代陶器模型中作為殉葬用的小件明器，而以東漢較常見，或可晚至六朝初期。

嵌件、裝飾品、生活用器、明器等之外，漢代牙骨器中尚見以骨材鐫刻文字作為記錄的文書。八〇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西安未央宮遺址發現了六萬餘片的骨簽文書，乃選用高級骨料，文字用書刀鐫刻，尺寸上不大，一般長五·八—七·二公分，寬二·一—三·二公分，厚〇·五公分，便於集中穿放。文字鐫刻後填以礦物顏料，每片刻一行字，或可至四行字，平均每片十餘字，六萬餘片可達數十萬字。所記事跡從西漢建國初期至滅亡為止，內容主要是國家「工官」——即製造系統的管理文

- 【註一一一】：貴州省博物館，〈貴州清鎮平壩漢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一九五九年第一期，頁八五至一〇三。
- 【註一二二】：《關氏所藏中國牙雕》，頁七二、七三，圖十一。
- 【註一二三】：同前書，頁七二、七三，圖一〇。
- 【註一二四】：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市博物館，〈廣州漢墓〉，頁三三〇至三三九，圖版一〇一至一〇八，頁四一六至四三一，圖版一四四至一五七。

- 【註一二五】：吳鎮烽、尚志儒，〈陝西鳳翔八旗屯秦國墓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北京，文物，一九八〇年五月）第三輯，頁六七至七九。
- 【註一二六】：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望都二號漢墓〉（北京，文物，一九五九年六月），頁八，圖八六。
- 【註一二七】：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磨嘴子三座漢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二年第十二期，頁九至二三。
- 【註一二八】：河南省博物館，〈靈寶張灣漢墓〉，《文物》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頁七五至九三。
- 【註一二九】：滁州市文物管理所，〈安徽全椒縣卜集東吳磚室墓〉，《考古》一九九七年第五期，頁九〇至九三。

書，涉及兵器、皇室乘輿等物，出土地點是未央宮第三號遺址的官署建築所在，位於西安市北郊未央宮的前殿遺址。【註一〇】當地農民回憶：「過去整地曾大量出骨簋，但作廢物棄置。」【註一二】學者認為是二十世紀繼一批漢代「竹簡」與「帛書」出土後的又一重大發現。【註一三】

玉丁寧館捐贈東周至漢代的牙骨器為數不少，的確可作此時牙骨工藝發展史的註腳。前曾述東周牙骨器有極大數量運用在當時的車馬上，若反映在這批捐贈文物時，除了確定是車馬器者（例如牙、骨細腰【註一三】、鑣具【註一四】等）外，應有一些骨管或也是車馬上的配件。這些車馬上的配件或者是一些不知功能的牙骨嵌件，若有雕刻或彩繪紋飾，可因紋飾裝飾方式作為斷代依據，若是光素之器，則需從其他方面（如磋磨技巧）作考量。例如一件「雕骨雲紋飾件」，長四·八公分，寬三·八公分，器做窄梯形，取骨片磋磨而成，器表浮雕雲紋。（圖八）這類雲紋與戰國或漢代玉器上連續雲紋約略相似，但因質材特性，紋飾雕磨較粗略。

玉丁寧館捐贈了幾件鑣具，或牙製，或骨製，多為光素者，但是有一件「磋角彩繪回紋鑣」，編號是國贈二八四三五，長一五·二公分，最寬二·八公分，最厚一·九公分，器乃取獸角磨製而成，剖面呈扁八邊形，鑣身中央鑿二方孔，以供裝嵌固定之用。器呈牙白色，後半段已為銅鏽染綠。近尾端以褐彩繪回紋為飾，局部回紋外傷蝕。（圖九）

【註一〇】：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城工作隊，〈漢長安城未央宮第三號建築遺址發掘簡報〉，《考古》一九八九年第一期，頁三三至四三與頁十九。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未央宮——一九八〇—一九八九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月），頁九一至一二二。

【註一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未央宮——一九八〇—一九八九年考古發掘報告〉，頁九一至一二二。
【註一三】：〈西安未央宮遺址出土三萬餘片骨簽文書〉，《中國歷史學年鑑·一九九〇》（北京，文物，一九九二年），頁三七二。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考古精華〉，頁二四五中曾發表其中兩片骨簽文書的彩色圖版。

【註一四】：嵇若昕，〈玉丁寧館捐贈牙骨竹木雕器目錄〉，頁二一、二二六、二二七。
【註一五】：同前書，頁六二至六五、二四二至二四四。

在科學出土實例中，西周墓葬中即曾出土剖面呈多邊或方形的骨角鑲具，例如河南省三門峽市上村嶺西周虢國墓中，曾出土十九件剖面呈「多角形」（即多邊形）的骨鑲；【註一二五】北京市西南琉璃河地區的西周燕國墓葬中則曾出土七件方形角鑲。【註一二六】但是這些骨角鑲具或無線繪圖，或者簡略，依據所公佈的資料看來，似並無紋飾，而多邊形者可能也不知是否是八邊形？

剖面呈八邊形的牙、骨、角鑲具，在山西省侯馬市上馬村春秋中期墓中即已出現，但是器表光素無紋（插圖二三）。【註一二七】屬於戰國早期的湖北隨縣曾侯乙墓中曾出土多件剖面為四邊形而髹漆彩繪紋飾的骨、角質鑲具，雖然這些鑲具不是八邊形，但是同墓所出的一種考古報告稱為「I式「馬鑲形器」的骨角器，共有十二件，剖面即呈八邊形。【註一二八】此外，山東長島王溝戰國早、中期墓葬層出土光素而剖面呈八邊形的骨鑲，【註一二九】河南輝縣戰國墓葬中出土的骨鑲也見剖面為八邊形者。【註一三〇】（插圖二四）東漢較大型墓葬中多殉明器，墓中車馬多粗具其形，細部的車馬器用不多；西漢初年大墓中仍見殉埋實用的車馬器，例如南越王墓的西耳室。【註一三一】若以廣州四〇九座兩漢墓葬為例，西漢前期墓葬中出土車飾者有四座，其中一座有車馬模型，另三座僅放車飾零件；就尺寸看，與實物接近，數量較多。【註一三二】西漢中期雖然仍出少量的車馬飾件，但多為錫製。【註一三三】西漢後期以後墓葬基本不見車馬飾件，遑論以整輛馬車殉埋者。

【註一二五】：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嶺虢國墓地》（北京，科學，一九五九年十月），頁二二。

【註一二六】：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一九七三—一九七七）（北京，文物，一九九五年七月），頁三三九、二四〇。

【註一二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馬墓地》（北京，文物，一九九四年三月），頁一四九、一五〇。

【註一二八】：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頁三二六、三二七。

【註一二九】：煙台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山東長島王溝東周墓葬》，《考古學報》一九九三年一月，頁八〇與圖一八：十七、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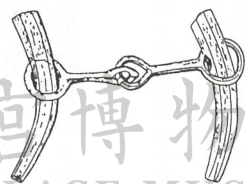
【註一三〇】：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輝縣發掘報告》（北京，科學，一九五六年三月），頁四四。

【註一三一】：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博物館，《西漢南越王墓》，頁九四至一〇一。

【註一三二】：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市博物館，《廣州漢墓》，頁一四六至一四七。



插圖二三 上馬村春秋中期墓出土之角鐮



插圖二四 輝縣戰國墓出土之銅環與骨鐮

因此，玉丁寧館捐贈的這件「磋角彩繪回紋鐮」應是東周的馬鐮。【註一三四】

在牙骨器上以紋飾的裝飾方式作為斷代依據的典型代表，或可謂漢代陰線針刻紋飾。就目前已發表的資料而言，戰國尚未出現這方面的實例，屬於漢代前期的南越王墓或中山靖王劉勝夫婦墓中已出現細線針刻的紋飾。東漢時牙骨器上的陰線針刻紋飾有退化的現象，六朝的牙骨器出土實例不多，也尚未發現陰線針刻的例證。【註一三五】因此，細線針刻紋飾相當具有時代性，故而也是漢代牙骨器裝飾技法的典型，某些牙骨器上的針刻紋飾，依其雕刻退化的情形，也不排除

可略晚至六朝初期階段。當時牙骨器上的陰線針刻紋飾與當時漆器、陶器上的彩繪或針刻紋飾的風格一致，例如龍、鳳、虎、奔鹿、神獸、飛鳥、雲氣、花、樹等等皆是常見的紋飾母題。

玉丁寧館捐贈的牙骨器上，不乏陰線針刻紋飾者，以雲氣紋居多，但是也有飛鳥、奔鹿、龍紋、虎紋等動物紋飾與花、樹等植物紋飾。【註一三六】在近二十件針刻紋飾的牙骨器上，幾乎皆填染顏色，或紅、或綠、或黑，刻痕纖細，線條流暢，

【註一三三】：同前書，頁二三八。

【註一三四】：筆者於《玉丁寧館捐贈牙骨竹木雕器目錄》中訂為戰國時器，或可略提早。見該書頁六五與二四三。

【註一三五】：林業強，〈商至元代的出土牙骨器〉，頁二六。

【註一三六】：嵇若昕，〈玉丁寧館捐贈牙骨竹木雕器目錄〉，頁七二至七八、八六、八八至八九、九二至九三、九五至九六、二四七至二五〇、二五三至二五四、二五六至二五七，即圖版九一、九二（兩件）、九三、九四、九五（三件）、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一〇〇、一一一、一一五、一一六、一一九、一二〇、一二一、一二二、一二三。

充分顯現漢代牙骨器上陰線針刻填彩紋飾的成就。此處僅舉其中的三件針刻填彩骨片嵌飾為例。這三件骨片的編號是國贈二八四五五、二八四五六、二八四五七，長約六、八公分，寬約一·〇公分，厚約〇·一公分，以骨磨製成長條形薄片，細線陰刻紋飾後以紅、黑兩色填彩，紋飾分別是雲虎紋、雲鳥紋與雲氣紋，虎紋矯健有力，鳥紋往上盡力飛翔，刻飾飛鳥的一片除了滿佈流雲紋外，尚刻山峰三座。（圖一〇）在西漢漆器上常可得見類似的細線陰刻雲氣與動物紋。此外，骨片上的虎紋與西漢滿城中山靖王劉勝墓中曾出土象牙六博棋子上的細線陰刻虎紋相類。類似的虎紋在漢代的彩繪陶器、畫像磚、畫像石與瓦當上都常得見。漢代人視虎為「四靈」之一，是一種神獸，認為「虎……壽千歲，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註一三七】神虎也是神人的坐騎，甚至出現仙人乘虎車的畫像石。【註一三八】而且「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執搏挫銳，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惡悟，燒虎皮飲之，擊其爪，亦能辟惡，此其驗也。」【註一三九】其中，「擊其爪」也有其他版本作「繫其衣服」或「繫之衣服」。【註一四〇】因此，虎紋出現在建築用陶、石器中，也常出現在器物上。

至於漢代的奔鹿紋，也與當時的神仙祥瑞思想關係密切。漢代人認為騎鹿也能超越險絕之處，鹿滿五百歲時變成純白色，白鹿能壽至千歲，【註一四一】故而也是神人的坐騎，並有乘鹿車升天的畫像。當時奔鹿紋旁常繚繞以雲氣紋。【註一四二】除了虎與鹿，牙骨器上曾出現的針刻紋飾如流雲、龍、鳳、神獸等，都與當時的神仙思想有關，故而這些針刻紋飾不僅僅是裝飾文樣而已，也呈現出漢人的宗教思想。當時人的思想中經常出現祥瑞辟邪與黃老識緯信仰，反映在器用紋飾上就是一再出現這類相關紋飾，牙骨器用不是當時器用的主流，骨片、骨管等往往只是嵌飾或配件，裝飾紋飾時仍不免表現當時的

【註一三七】：葛洪，《抱朴子·內篇》，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景印）第一〇五九冊，卷一（對俗），頁一〇五九—一一（下）。

【註一三八】：吳曾德，《漢代畫像石》（台北，丹青，民國七十五年三月），頁一三六。

【註一三九】：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台北，明文，民國七十七年三月再版），卷八（祀典），頁三六八。

【註一四〇】：同前書，頁三七三。

【註一四一】：葛洪，《抱朴子·內篇》，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〇五九冊，卷一（對俗），頁一〇五九—一一（下）。

【註一四二】：周到、王曉，《漢畫—河南漢代畫像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二月），頁一〇一。

宗教現象，不過似乎僅出現在針刻或彩繪紋飾，浮雕紋飾則多模仿玉器、銅器紋飾。

玉丁寧館捐贈的漢代牙骨器上的紋飾除了陰刻與陽雕者外，也有彩繪的實例，而且是繪飾在實用器——骨尺上。至民國七十年（一九八一）為止，漢墓出土的各種質材製成的尺最少已有四十把，完整者長短尺寸約略相同，總在二十三公分左右。

【註一四三】玉丁寧館捐贈的骨尺有兩把，一件編號是國贈二八四八八，長二二·八公分，寬一·八公分，厚〇·四公分，長條形，略顯彎曲，一端有一徑約〇·二公分的小孔。牙白色，兩端飾網紋，正中繪一奔馳中之馬車，馬車左右紋飾已漫漶，似雲氣紋；另一面兩端亦飾網紋，中央紋飾漫漶。紋飾用墨色勾線，局部填紅彩。用墨色所劃刻度依稀尚存，從殘存刻度度量，一寸約為二·五公分。（圖一一）另一件編號是國贈二八四八九，長二二·八公分，寬一·八公分，厚〇·四公分，也作長條形，略顯彎曲，一端有一徑約〇·二公分的小孔。牙白色，兩端飾網紋，正中繪一組流雲，流雲左右各繪一組雲氣紋，紋飾大半剝落，但仍依稀可見其遺痕，紋飾皆用黑料勾繪；另一面兩端亦飾網紋，中央紋飾漫漶，紋飾用黑色勾線，局部填紅彩。此尺所用黑料黝黑，線條略自器面突起，可能用生漆描繪。（圖一二）這兩把尺之質材似以牙為材，但世人多稱之為骨尺。

這兩件骨尺兩端所繪飾的網紋與一九七六年九月，在河南省盧氏縣城關鎮西北街村號台廟一座東漢墓中出土的彩繪骨尺，其兩端各一寸處所飾網紋相似，後者中間飾三組雲紋，紋飾均用墨色勾線，填染紅、綠色。玉丁寧館捐贈的骨尺中「彩繪雲紋骨尺」（國贈二八四八九）的風格與裝飾方式與出土的這件東漢彩繪骨尺類似，乃屬於同時代之物。至於另一件「彩繪車騎出行紋骨尺」（國贈二八四八八）上的車馬前殘留一前導人之上身，與漢代畫像中的同類紋飾相似。車騎出行、遊幸田獵與鬥雞走狗都在漢代王宮貴戚、世家豪門子弟中相息成風。【註一四四】在漢代畫像中出現的車輿有三種，一種是輿上無蓋的「輕車」，一種是有蓋的「輶車」，第三種是帶蓬的「輜、駟車」，蒙遮車輿的頂部與兩旁而無後轆者為輜車，有後轆

【註一四三】：國家計量總局主編，邱隆、丘光明、顧懋森、劉東瑞、巫鴻編，《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圖版說明》頁一至四。

【註一四四】：周到、王曉，《漢畫——河南漢代畫像研究》，頁三七。

即是駟車。【註一四五】三種車輿之中，以駟車最常出現。玉丁寧館捐贈的這件「彩繪車騎出行紋骨尺」的紋飾雖然相當漫渙，仍看得出車輿上有棚，應是輶車或駟車。至於訂年，仍以「東漢」為宜。

除了車馬器與生活實用的骨尺，玉丁寧館所捐贈漢代的牙骨器中也有休閒生活所需的六博棋子與六博箸，前者光素，後者陰刻圈點紋與線紋，但不是針刻紋飾。【註一四六】至於象生小動物也有牙、骨鳥、雞、豬與青蛙等等。編號國贈二八四四八是一件雕牙鳥，高一·一公分，長一·七公分，刀法簡率，身軀正中豎穿一小孔（圖一三）；國贈二八四七七是一件雕骨鳥，高一·二公分，長一·二公分，圓雕飛鳥，弧形大喙，雙翼高舉，一翼殘缺，尾羽平展，線刻羽紋；身軀正中豎穿一小孔。（圖一四）這兩件小鳥身軀皆有一穿孔，可能原為穿飾之一。【註一四七】

除了有穿孔的象生小動物，玉丁寧館還捐贈了幾件無穿孔的象生小動物。其中，四件雕牙小豚編號是國贈二八四四三、二八四四六，長一·九—二·五公分，高一·二—二·四公分，（圖一五）尺寸和形制與香港關善明所收藏的其中兩件相似，後者依據河南新鄭春秋晚期至戰國時期的韓故城製骨作坊遺址中出土的一件骨雕動物，似虎又似犬，刀法簡鍊，長僅三·二公分，高僅一·四公分，【註一四八】而將時代訂為「戰國至漢」，【註一四九】筆者原也因循之【註一五〇】。但是新鄭韓故城製骨作坊遺址出土的骨雕動物為扁平片狀，而非圓雕，並為孤例。雖然春秋戰國墓葬中的陶牛車也搭配出現陶牛俑，但尺寸較大，這類小形象生動物除了有穿孔作串飾者外，無穿孔者或為陶樓、陶屋、陶城堡等模型中的配件，作成豬形，可搭配豬圈作為明器，而且這類象生明器常見於東漢墓葬，也可晚至六朝初期。

【註一四五】：吳曾德，《漢代畫像石》，頁一七八至一八一。

【註一四六】：嵇若昕，《玉丁寧館捐贈牙骨竹木雕器目錄》，頁八〇至八一、二五〇至二五一，圖版一〇三至一〇五。

【註一四七】：筆者於《玉丁寧館捐贈牙骨竹木雕器目錄》中訂雕牙鳥為「戰國至漢」，擬更正為漢代，見該書頁七〇與二四六，圖版八九。

【註一四八】：河南省博物館新鄭工作站、新鄭縣文化館，《河南新鄭韓故城的鑽探和試掘》，《文物資料叢刊》第三輯，頁五六至六六。

【註一四九】：《關氏所藏中國牙雕》，頁七二，圖一〇。

【註一五〇】：嵇若昕，《玉丁寧館捐贈牙骨竹木雕器目錄》，頁七〇、二四五、二四六，圖版八九。

玉丁寧館捐贈無穿孔的象生小動物尚有兩件雕牙雞，原誤認為是「鳥」【註一五二】，經仔細比對，以明器中之「雞」為宜，因尺寸甚小（編號國贈二三四七八，殘長二·七公分，殘高一·六公分；編號國贈二三四七九，殘長三·〇公分，殘高二·一公分），腿爪僅雕成一小方座。（圖一六、一七）在甘肅武威東漢墓出土的木製雞舍旁的兩隻木質栖雞未曾雕製爪足，即可為例。【註一五三】至於另一件雕骨蛙，編號是國贈二八四四七，（圖一八）高一·二公分，長二·四公分，寬一·七公分，原誤以為是戰國時骨器，【註一五三】茲亦更正為漢代至六朝初期，並擬定為當時搭配水上樓閣類模型的象生小動物，就好似河南靈寶張灣二號東漢後期墓中出土的一件水上樓閣陶模型，在方盤式水池內有小魚、龜、蟹和青蛙等水生動物。【註一五四】

玉丁寧館所捐贈戰國至漢代陰刻圈點紋的牙骨器不少，或填彩，或無彩，有些並可在近年出土墓葬或遺址中得見形制幾乎一樣之器，例如三件「雕骨填紅彩圈點紋飾件」，國贈二八三九四的一件乃取一長段骨材，三分之二部位磋磨成尖錐狀，另一端磨成長方形，上方飾三道填紅彩陰線，下方以對角交叉陰線分出四個三角形塊面，其內各陰刻填紅彩圈點紋為飾；長方形之上方磋磨出一側面鳥首紋，陰刻填紅彩圈點紋作眼紋。長方形側面深鑿二凹槽，以供嵌插於他物上。（圖一九）另外兩件都沒有尖錐狀部份，一件的鳥首部後突起一段，有折斷痕跡（國贈二八三九五，圖二〇），另一件的鳥首部位之側面有明顯新近打磨痕（國贈二八三九六，圖二一）。【註一五五】在湖北江陵鳳凰山的西漢墓（M九）即曾出土一件形制與紋飾相似之骨器，紋飾內填紅彩與黑彩，考古工作者名之為簪。但是此墓人骨已朽腐無存，葬式不明，無法就出土位置（與墓主人的關係）判定功能。【註一五六】是否確是插於髮際的「簪」，仍有待進一步的資料證實。

【註一五一】：同前書，頁八三、二四二，圖版一〇七、一〇八。

【註一五二】：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磨嘴子三座漢墓發掘簡報》，頁二三，圖三〇。

【註一五三】：嵇若昕，《玉丁寧館捐贈牙骨竹木雕器目錄》，頁七〇、二四六，圖版八八。

【註一五四】：河南省博物館，《靈寶張灣漢墓》，頁七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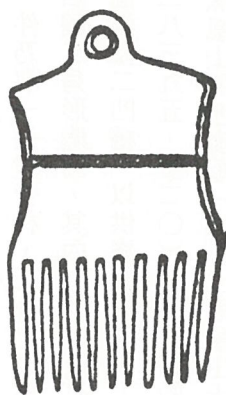
【註一五五】：嵇若昕，《玉丁寧館捐贈牙骨竹木雕器目錄》，頁四六、四七、二三七與二三八，圖版五五、五六與五七。

第四節 餘論

玉丁寧館捐贈的牙骨器中，屬於人首部位的器用除了筭、簪與釵外，另有八件梳篦與兩件梳柄，時間跨度長達三千年左右。時人王仁湘於二十多年前曾根據當時出土的梳篦（包括銅、玉、牙、骨、木等質材），排列出我國梳篦發展序列簡圖（插圖二五），他將我國梳篦發展列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史前時代至春秋末期，歷經四千年之久，流行長方形梳，以豎

階段	時代	演進序列	演變過程
一	新石器—春秋		
二	春秋戰國之交		
	戰國—兩漢		
	隋唐		
	宋—明初		
三	明		
四	明		

插圖二五 梳篦發展示意圖



插圖二六 寶雞出土之西周銅梳

長形為主，齒數較少；第二階段從戰國早期到唐代末期，歷一千四百年上下，流行箕形梳篦，以西晉時代為界，前段為豎長箕形，後段為橫長箕形。由於製作技術提高，齒數逐漸有所增加；第三階段從五代到明代初期，歷約五百年，流行半月形梳篦；第四階段從明代中葉開始，流行長條形梳篦。其文中曾提及一些新石器時代至戰國遺址或墓葬出土的一些長柄帶齒骨

【註一五六】：長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湖北江陵鳳凰山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四年第六期，頁四一至六一。

器，這些骨器的齒短，齒數也少，雖然發掘報告者稱之為骨梳，作者並未列入。【註一五七】嗣後，作者另外撰文，認為這些齒短、齒數也少的骨器是古代食具中的叉，【註一五八】不可與梳篋相提並論。玉丁寧館捐贈的牙骨梳篋正可作為王仁湘有關梳篋發展序列的註腳。今僅搭配出土資料，藉這十件牙骨梳篋或梳柄，略窺我國梳篋形式的發展史。

首先是編號國贈二八三六八的一件牙梳（圖二二），長七·六公分，寬四·八公分，厚〇·四公分，全器由一塊牙材磋磨而成，柄部中段內凹，利於執拿；十六根梳齒，兩端乃梳背之延伸；磋磨工藝樸拙。依據王仁湘所做的梳篋發展規律，應是史前時代到春秋末期第一階段的梳篋。但是這件牙梳磋磨工藝樸拙，不至於晚至春秋時期，但也不早於商代早期，因為商代晚期開始「梳背和握手有的已出現變異，上部已不是規整的方形，」一直延續至西周。【註一五九】例如，山東滕縣前掌大商代中晚期遺址中曾出土一件骨梳，長一〇公分，其中腰內縮的製作工藝即可作為這件牙梳的參考。【註一六〇】至於陝西寶雞竹園溝墓地出土的西周銅梳，也見中腰內縮的情形。【註一六一】（插圖二六）雖然山東臨淄春秋末期的陪葬坑中所出土的骨篋也有中腰內縮的情形【註一六二】，但是玉丁寧館捐贈的這件編號為國贈二八三六八的牙梳製作工藝相當樸拙、原始，因此該梳不但可作為第一階段的實例，更可以縮小訂年範圍，以「商後期至西周」為宜。

編號國贈二八三六九的牙梳與編號二八三七〇的牙梳柄可並列討論。前者長八·八公分，最厚二·五公分，全器已殘，下端有二榫孔以便安插梳身，上端左右亦各有一榫孔以安插立雕飾件（或為鳥首），皆已佚。梳柄飾以兩條高浮雕的蛇，左右僅餘鳥身與鳥尾，自上方俯視梳柄，兩端呈展翅飛鳥身軀；中央為牙材本身長圓形孔，另用牙材填塞。梳柄呈梯形，自端

【註一五七】：王仁湘，〈中國古代梳篋發展簡說〉，《湖南考古輯刊》（長沙：岳麓書社，一九八七年）第四輯，頁七九至八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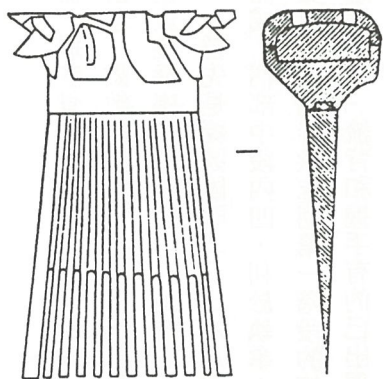
【註一五八】：王仁湘，〈中國古代進食具匕、箸、叉研究〉，《考古學報》一九九〇年第三期，頁二六七。

【註一五九】：王仁湘，〈中國古代梳篋發展簡說〉，頁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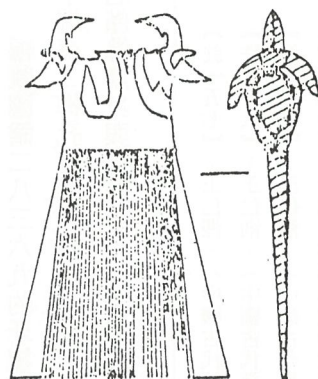
【註一六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考古精華》，頁一七二，圖一四一：左。

【註一六一】：盧連成、胡智生，〈寶雞強國墓地〉，頁七九、八〇，圖六三：七與頁一六三，圖一二六：一三。

【註一六二】：山東省博物館，「臨淄郎家莊一號東周殉人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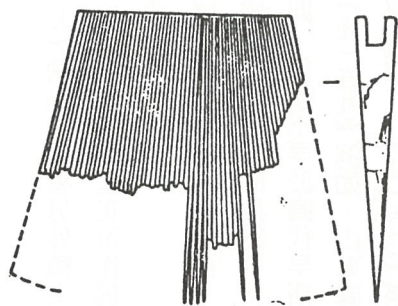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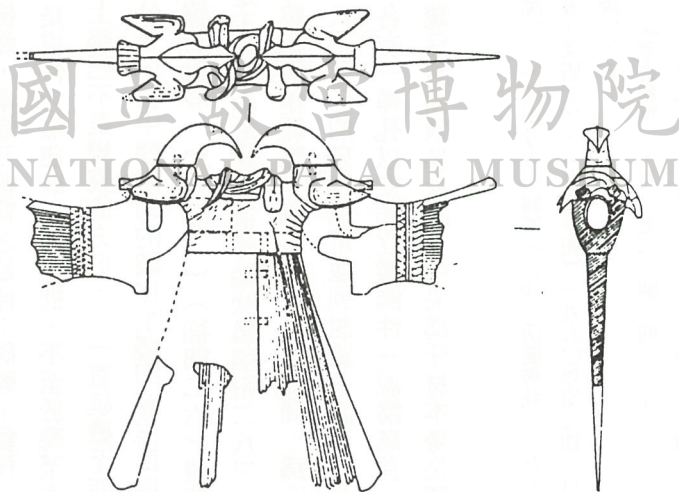


插圖二八 魯故城出土之象牙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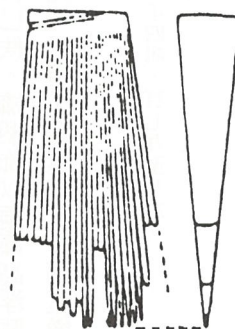


插圖二七 王溝出土之骨梳

插圖二九 西上園出土之牙梳



插圖三一 上馬墓地出土之骨梳殘件



插圖三〇 侯馬晉國遺址出土之骨梳殘件

部密刻梳齒，但是並不鑿透，僅略在中央偏下方處開始穿透。全器雕工古樸，並已被染成淡綠色，但是梳柄仍殘留原紅彩。（圖二二）

另一件長四·九公分，最厚二·二公分，應是一似前一件牙梳的柄部；下端有二榫孔以便安插梳身，上端左右亦各有一榫孔以安插立雕飾件（或為鳥首），皆已佚。梳柄飾以兩條高浮雕的蛇，左右僅餘鳥身與鳥尾；中央為牙材本身長圓形孔，一端用一塊牙材填塞，另一端之填塞物已佚。全器雕工古樸，並已被染成淡綠色。（圖二四）

山東曲阜春秋晚期魯國墓葬中曾出土一件牙梳，也是由梳柄與梳身兩部分組成，梳柄雕刻紋飾與前述兩件雷同，但是報告撰寫者未曾述明是否有榫孔以供插飾鳥首類配件。【註一六三】（插圖二七）山東長島王溝春秋晚期墓葬（M四）中也曾出土一件骨梳，梳柄即雕刻成一對相向的小鳥，其間並浮雕二蛇為飾。【註一六四】（插圖二八）香港收藏家關善明也藏有一件由梳柄與梳身組成的牙梳，除梳齒略有傷缺外，梳柄相當完整，梳柄紋飾與前述四件相似，但是左右鳥身榫孔內各插著對視的鳥首。這件牙梳梳柄寬六·九公分，梳身長六·四公分。【註一六五】

除此之外，山東萊蕪西上崗戰國墓葬也曾出土兩件牙梳，亦分成梳柄與梳身，梳柄部所浮雕的兩條蛇紋比例上較前述四件小，其立雕鳥首依然保存，其中一件梳柄之兩側尚各以榫卯接一小梳，與大梳身構成三梳一體。因器較完整，通高有一〇·三公分。（插圖二九）另一件雖然梳柄兩側的小梳身已失，通高卻有一〇·九公分。作者將這兩件牙梳與曲阜春秋晚期魯國墓葬中出土一件牙梳相比較，認為「從製作工藝看，西上崗牙梳可能晚於魯國故城牙梳，時代可能在戰國初期或中期。」【註一六六】而且，西上崗的兩件牙梳梳身上窄下寬，比例上梳身末端比魯故城牙梳更往外撇。

【註一六三】：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省博物館、濟寧地區文物組、曲阜縣文管會，《曲阜魯故城》，頁一一〇。

【註一六四】：煙台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山東長島王溝東周墓葬》，頁八〇。

【註一六五】：《關氏所藏中國牙雕》，頁七〇、七一，與封面。

【註一六六】：劉慧，《山東萊蕪西上崗出土青銅器及雙鳳牙梳》，《文物》一九九〇年第十一期，頁五九至六四。

關善明所藏牙梳梳身也是上窄下寬，末端外撇程度比較接近西上崗出土的牙梳；玉丁寧館捐贈的編號國贈二八三六九牙梳，梳身與王溝、西上崗和關善明所藏者相類。後三者四件牙梳鳥首仍存，可作為玉丁寧館捐贈之編號國贈二八三六九牙梳與編號國贈二八三七〇牙梳柄上端缺飾的配件之參考。至於梳柄兩端立鳥下腹部外突程度，曲阜魯故城與王溝春秋晚期墓出土者最短，似不能嵌插他件。關善明所藏者與玉丁寧館所捐贈帶梳身者皆較突出，是否可插小梳身，俟考。不過玉丁寧館所捐贈的牙梳與牙梳柄剖面弧度比較接近西上崗所出土者。無論如何，曲阜魯故城、長島王溝與萊蕪西上崗墓葬出土的梳柄之形制和雕工，皆可作為玉丁寧館捐贈者斷代之依據，都是東周的牙梳。【註一六七】這類梳柄飾浮雕鳥紋與略呈蛇紋的四件牙梳皆出於山東地域，是否是地區性文物！

類似梳身尾端向兩側撇出的出土實例，除了前述山東地區者為，在山西侯馬晉國遺址中也曾發現一件骨梳殘件，不見梳柄部位，梳身頂端有殘樺，尾端向兩側撇出。【註一六八】（插圖三〇）此外，侯馬市上馬墓地春秋中期晉國墓葬中也曾出土三件形制相近的骨梳，梳柄已朽，梳身尾端兩側皆向外撇出。【註一六九】（插圖三一）長治分水嶺M二七〇所出土的一件竹梳，梳身尾端已殘，但仍可看出向兩側撇出，梳柄頂端兩側突出呈細條狀，全器殘長五公分，此墓葬推斷年代是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註一七〇】其實在商代後期的梳篋即有梳身尾端向兩側撇出的情形，例如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兩件玉梳中，有一件梳柄雕飾雙鸚鵡者（標本五二二），梳身即向兩側撇出，同墓中共出的另一件玉梳（標本五五七）與骨梳（標本三二五）梳身尾端外撇的現象並不顯著。【註一七一】另在山西石樓出土的商代後期銅梳，梳柄上緣有鳥形立飾，握手處飾回

【註一六七】：林業強在《關氏所藏中國牙雕》，頁七〇中認為關善明所藏牙梳「應比曲阜標本年代為早」，則存疑。

【註一六八】：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鑄銅遺址》（北京，文物，一九九三年十一月），頁四二一、四二二，圖二二五：十三。

【註一六九】：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馬墓地》，頁一四七、一四八。

【註一七〇】：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晉東南工作組、山西省長治市博物館，《長治分水嶺二六九、二七〇號東周墓》，《考古學報》一九七二年第一期，頁六三至八五。

【註一七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頁一四九至一五〇與頁二〇六至二〇八。

紋，梳身略傷殘，若延伸尾端，也向兩側撇出。【註一七二】雖然如此，直至西漢依然並存梳身平直不外撇的梳篋。

玉丁寧館捐贈牙骨梳篋，除了前述國贈二八三六九者為梳身尾端向兩側外撇外，另一件編號國贈二八三七一的象牙梳也是梳身尾端外撇，殘長五·三公分，寬五·九公分，全器由兩塊牙片組成，一片作梯形梳柄，頂端向兩側突出呈細條狀，已染成綠色，有一面尚有褐彩紋飾；另一片雕製成梯形梳身，梳齒密佈，但已殘缺，再經修磨。（圖二四）基於這件象牙梳的梳柄頂部兩端突出，一面有褐彩紋飾，參考山西長治分水嶺M二七〇所出土的竹梳，以及「戰國中晚期，木梳篋的握手往往兩面都繪有圖案化的立鳥等動物以及幾何形紋飾」【註一七三】的現象，擬定這件象牙梳是戰國時器，以待更進一步的科學考古出土資料作比對。

玉丁寧館捐贈的另一件也訂為戰國之虎柄骨梳（國贈二八三七二）（圖二六），長七·四公分，柄寬六·八公分，乃用兩塊骨材磨製而成，柄部磨成二尾部相連之回首虎紋，再以褐彩繪虎斑及眼、耳等部位，褐彩斑駁脫落。十九根梳齒自頂部開始刻鑿，但並不刻透，僅離端部三分之一處開始鑿透，梳齒端部微外侈，但一端外侈部位可能因經常使用而平齊。梳柄與梳齒間各鑿二小孔，以供插樺相接。這件骨梳梳柄虎紋與戰國玉器中虎紋頗為相似，但以玉為材，所琢磨紋飾常較精細。

春秋晚期開始出現梳柄上緣兩端逐漸呈圓角的情形，戰國兩漢梳篋以豎長式箕形居多。玉丁寧館捐贈的牙骨梳篋缺乏類似實例。西晉時期，橫長式箕形梳篋開始出現，一直延續至隋唐時代。魏晉以來，婦女頭上流行插戴梳篋，至唐代更盛，遲至晚唐、五代，有時一位婦女髮髻上插戴十數把梳篋，唐代詩人王建「宮詞」曾說：「歸來別賜一頭梳。」【註一七四】唐代的梳篋有金、銀、銅、玉、貝、牙、骨、木等質材。此時梳篋逐漸往橫向發展，並向半月形梳篋發展。玉丁寧館捐贈的牙骨梳篋中有兩件是唐代的梳柄，一件光素（國贈二八五〇四），一件淺浮雕花鳥紋飾（國贈二八五〇三），兩面紋飾不同；連

【註一七二】：石樓縣人民文化館，〈山西石樓義牒發現商代銅器〉，《考古》一九七二年第四期，圖三。

【註一七三】：王仁湘，〈中國古代梳篋發展簡說〉，頁八二。

【註一七四】：王建，〈王司馬集〉，收於《四庫全書珍本》（台北，故宮景印）第十集，卷八，頁二十。

接梳齒部位有數十道刻鑿梳齒之遺痕，另三緣刻飾短鋸齒紋，其內突弦紋兩道，在器上方弦紋部位鑿二小孔；弦紋內刻飾一圈連弧紋，二孔下方飾一朵花，器中央一面飾淺浮雕折枝花，一面淺浮雕折枝花上飾一展翅鴻雁；兩面皆陰刻菱格紋襯地。（圖二七）類似鴻雁紋飾在唐代金銀器上一再得見。唐代以後，梳篋的寬度顯著增加，從寬箕形發展為半月形，王仁湘認為宋元（包含遼、金）時代的半月形梳篋長度在一〇—一五公分，寬度在七公分左右，「明器較小」。【註一七五】但是福建福州南宋黃昇墓中曾出土五件角質梳篋，一件木梳。木梳長一〇·一公分，高六公分；角梳長一四·五公分，出土時收貯於一漆奩的第三層，另四件黑色角篋長度在九·二至一〇公分之間，出土時均插於墓中主人髮髻前後四周。【註一七六】宋代婦女流行高大髮髻，髮間往往也插戴梳篋，黃昇是南宋福州的一位官家小姐，於淳祐二年（一二四二）年十六歲嫁與宋朝宗室朝議大夫趙師恕二十歲孫子趙與駿為妻，結婚不到一年去世，家屬將其生前使用器物四百餘件殉葬。他墓中一四·五公分長的角梳收貯於漆奩中，髮髻間插戴的梳篋較小。因此，長度小於一〇公分的梳篋不見得全是明器，也可能是髮髻裝飾，需再依據製作工藝的精粗程度作考量。

宋元時代流行的半月形梳篋，也有前後期的分別，初期梳齒長度雖自中央向兩端遞減，但是兩端往往急速收止，梳齒部位與梳柄相接的三邊介於口形與圓弧形之間，後來這兩端的梳齒愈來愈短，梳齒部位兩端往銳尖發展，梳齒部位真正形成「半月」形。這個變化約發生在北宋晚期，例如山西太原一座北宋晚期墓葬中曾出土的一件木梳篋，梳齒部位即呈弧度圓滑的「半月」形。【註一七七】南宋黃昇墓中出土的梳篋的梳齒部位形式相似。雖然北宋晚期即已出現梳齒部位弧度圓滑的半月形梳篋，但是梳齒兩端急速收止，使得梳齒部位與梳柄相接的三邊介於口形與圓弧形之間的半月形梳篋，至元代仍使用【註一七八】。也就是說，雖然梳齒部位弧度圓滑的半月形梳篋已出現，並未取代原來的形式。

【註一七五】：王仁湘，〈中國古代梳篋發展簡說〉，頁八三。

【註一七六】：福建省博物館，〈福州南宋黃昇墓〉（北京，文物，一九八二年三月），頁七九。

【註一七七】：代尊德，〈太元小井峪宋墓發掘記〉，〈考古〉一九六三年第五期，頁二五九至二六三，圖版八：五。

玉丁寧館捐贈的牙骨梳篋中，有三件屬於宋元時代者，其中一件牙梳（國贈二八五一四）製作較粗拙，不排除僅作明器。另兩件值得一提：一件編號是國贈二八五二三，長九·一公分，寬五·二公分，背厚〇·七公分，全器由五塊牙材製成，合併之即呈半月形，中央三塊兩側各有二小孔，最外面兩塊內側也有二孔，可藉插榫相接成一器。器之背寬大致相同，兩端平直，梳齒長度由中央向兩側依序遞減，齒與背之間陰刻二道弦紋間隔。器表有蝕痕，梳齒亦有殘損。（圖二八）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在遼寧省朝陽縣前窗戶村的一座遼代墓葬中出土的一件半月形牙梳，梳背兩端也較直，梳齒長度亦由中央向兩側依序遞減，長九公分，寬三·七公分，背厚〇·七公分。【註一七九】二者的梳齒部位與梳柄相接的三邊皆是介於口形與圓弧形之間，但是後者並未分成數段，不過三十年代前後在洛陽也曾出土骨梳，乃橫長式箕形，也分成五段，有六十五根梳齒。【註一八〇】

玉丁寧館另捐贈一件梳齒部位之弧度圓滑的半月形牙梳（國贈二八五一五），殘長八·五公分，寬三·六公分，背厚〇·三公分，全器呈半月形，一端銳尖，另一端已殘，原應仍呈尖銳形。因紋飾所需，器之背寬中央稍大，梳齒長度由中央向兩側依序遞減，梳背雕飾鏤空花卉紋，間描金為飾，花瓣部位尚填白彩。（圖二九）一九七五年北京一座金代女性墓葬中曾出土七件梳背有十數個對稱穿孔的骨梳，個別的有黑漆描金裝飾。【註一八一】懷履光於《洛陽故城考古》（William Charles White: *Tombs of Old Lo-yang*）書中也曾發表一件三十年代當地出土骨梳，不論形制與鏤空紋飾皆與玉丁寧館捐贈的這件牙梳相似。【註一八二】至於香港關善明所收藏的一件有鏤空填金紋飾的牙梳，與後者的形式與紋飾更相似，不過梳齒傷殘更甚。

【註一七八】：例如浙江海寧的一件元代墓葬中即曾出土一件木梳，梳齒部位與梳柄相接的三邊即介於口形與圓弧形之間。見〈浙江海寧元代賈椿墓〉，《文物》一九八二年第二期，頁二二、二三。

【註一七九】：靳楓毅，〈遼寧朝陽前窗戶村遼墓〉，《文物》一九八〇年十二月，頁二四。

【註一八〇】：William Charles White（懷履光）：*Tombs of Old Lo-yang*，p. 94, Plate LXI.

【註一八一】：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北京市通縣金代墓葬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七年第十一期，頁一四，圖一一。

【註一八二】：William Charles White（懷履光）：*Tombs of Old Lo-yang*，p. 93, Plate LX.

【註一八三】

由於前述參考資料，故而國贈二八五—三的一件牙梳擬訂為宋、遼至元時的牙梳，有鏤空紋飾者（國贈二八五—五）擬訂為宋、金至元時的牙梳。玉丁寧館所捐贈的牙骨梳篋中最大的一件乃用象牙製成（國贈二八五—六四），長一九·二公分，寬五·七公分，長條弧形，梳背厚而圓弧，並向兩端下延，梳齒居中而等長。梳背兩面皆淺浮雕雙龍爭珠紋，其兩端又各淺浮雕佛家八寶之二，依序是輪、螺、傘、蓋，與花、罐、魚、腸。器呈牙黃色。（圖三〇）在王仁湘所排列的梳篋發展序列中，這是屬於第四階段在明代中葉前後發展成的長條形梳篋，而且是再晚一些梳齒部位變成了弧排齒形式的梳篋。清代之後，梳篋種類增加，改變了過去一個時代一個樣的局面。【註一八四】

王仁湘曾說：「弄清了梳篋的發展演變規律，我們比較容易認定某種梳篋的大致年代，客觀上還可以幫助考古學其他問題的斷代。」【註一八五】玉丁寧館捐贈的這些牙骨梳篋，可一一歸入王仁湘所排列的梳篋形式發展脈絡的四個階段，在標準序列中，尚可分出細部的變化。例如第一階段末期至第二階段初期（即春秋戰國時期），從長方形梳篋往豎長式箕形梳篋發展，此時梳身兩側向外撇出的情形並非特例，但是梳柄浮雕雙蛇紋飾，兩端雕飾立鳥的牙骨梳，是否具有地域性，是頗值得思考的課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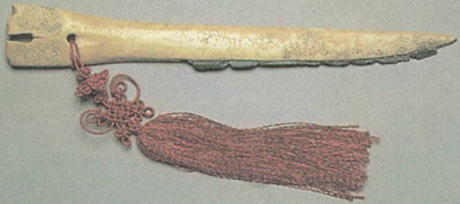
前述梳篋除供梳理頭髮外，大多可供髮髻插戴，玉丁寧館另又捐贈兩件尺寸甚小的象牙梳篋（國贈二八五—六五，二八五—六六，圖三一、三二）一件長六·一公分，寬一·六公分，最厚〇·三公分，另一件長一〇·四公分，寬二·九公分，都為清代文物，是當時男性梳理鬚髭的用具，【註一八六】的確是如王仁湘所言：清代之後，梳篋種類增加，不再像過去一個時代一個樣的局面了。

【註一八三】：《關氏所藏中國牙雕》，頁一二二、一二三。

【註一八四】：王仁湘，〈中國古代梳篋發展簡說〉，頁八四。

【註一八五】：同前註，頁八五。

【註一八六】：嵇若昕，〈玉丁寧館捐贈牙骨竹木雕器目錄〉，頁一五四、一五五與頁二七七、二七八，圖版一九二、一九三。

		
圖二 新石器時代晚期 雕骨彎刀 國贈 28336	圖一 新石器時代晚期 雕骨嵌石刀 國贈 28335	
	 圖四 商代後期—西周初期 雕牙魚形珮 國贈 28344	
圖七 西周 雕骨鳥首笄 國贈 28355	圖六 商代 後期—西周 雕牙鳥首笄 國贈 28354	圖五 商代 後期—西周 雕牙鳥首笄 國贈 28353
 (上)圖八 戰國—西 漢 雕骨雲紋飾件 國贈 28427  (右)圖三 商代後期 雕骨獸面紋飾 件 國贈 28343		



圖二五 戰國 象牙梳 國贈 28369



圖二六 戰國 虎柄骨梳 國贈 283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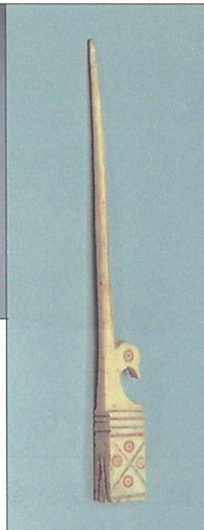
圖二四 東周 牙梳柄 國贈 28370



(右)圖一九 戰國—漢 雕骨填紅彩圈點紋飾件 國贈 283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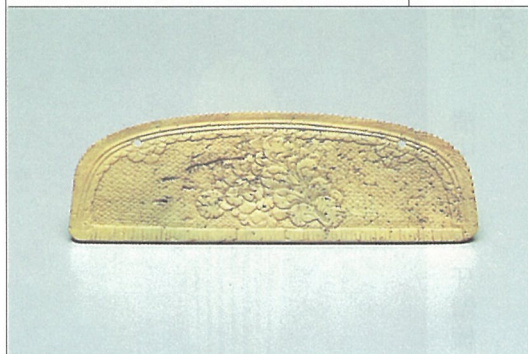
(中)圖二〇 戰國—漢 雕填紅彩圈點紋飾件 國贈 28395

(左)圖二一 戰國—漢 雕骨填紅彩圈點紋飾件 國贈 283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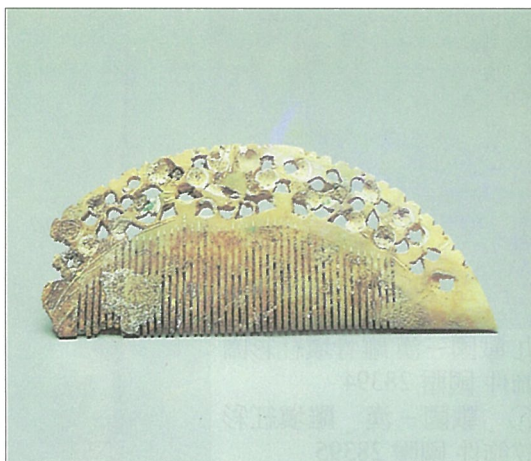


圖二三 東周 牙梳 國贈 283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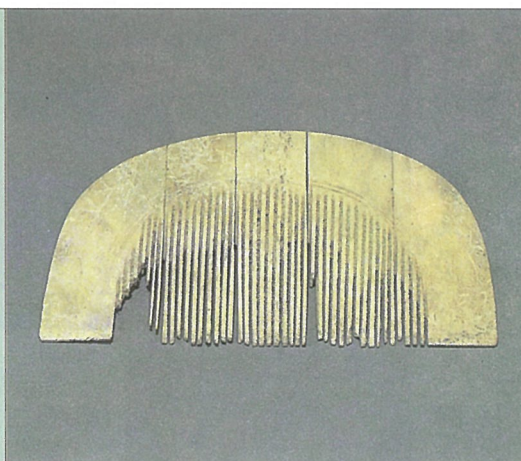
圖二二 商代後期—西周 牙梳 國贈 283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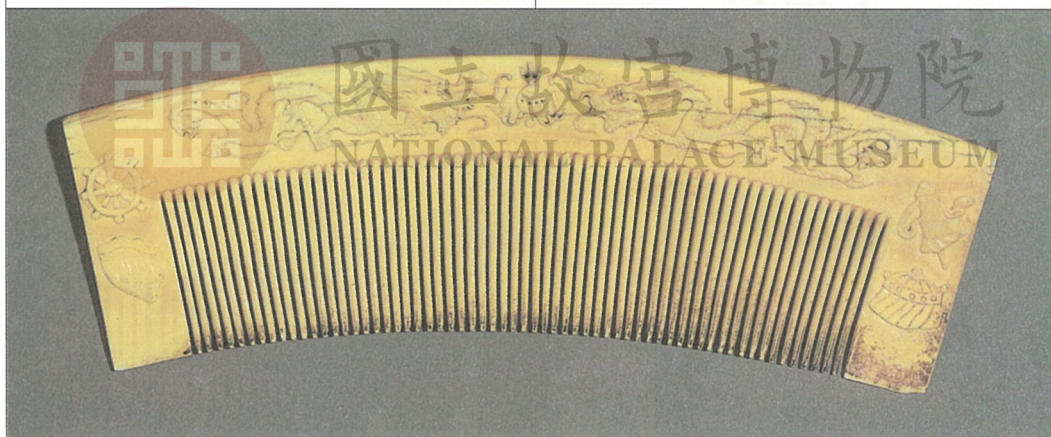
圖二七 唐 雕牙花鳥紋梳柄 國贈 28503



圖二九 宋、金—元 牙梳 國贈 285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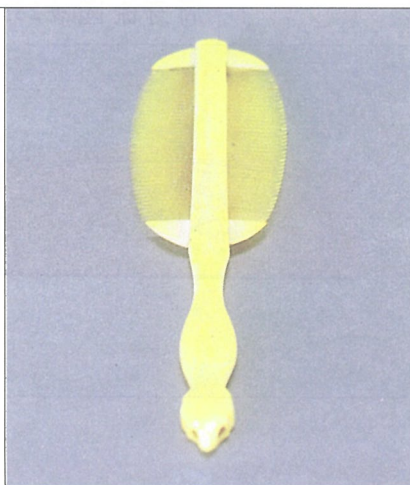


圖二八 宋、遼—元 牙梳 國贈 28513



圖三〇 清前期 雕象牙龍紋八寶梳 國贈 28564

圖三一 清 象牙鬚篦國贈 28566



圖三一 清中、晚期 牙鬚梳 國贈 28565



*A Study on Ivory and Bone Objects Donated from
the Yü-ting-ning Studio:
The Han and Pre-Han Period**

Chi, Jo-hsin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ABSTRACT**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Taipei is home to a wealth of precious works of Chinese art. Objects carved from ivory and bone are certainly not lacking, but they mostly date from the Ch'ing dynasty (1644-1911). None, in fact, are from China's antiquity. In 1997, a selection of the finest carvings in ivory, bone, and bamboo, and wood (spanning 5-6,000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 were donated from the Yü-ting-ning Studio to the Museum by Director Ch'in Hsiao-yi (who had amassed them over the years). The works total 237 sets (296 individual items) that range in date from a late Neolithic stone-inlaid bone knife to elephant ivory and bamboo carvings of the late Ch'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 The present study involves a selection of representative ivory and bone objects from the Han and pre-Han period. Through comparison with other objects in collections and archaeologically excavated materials as well as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a study and analysis of these objects offers a glimpse into the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the art of ivory and bone carving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the Han dynasty in China.

Thousands of years ago in the Paleolithic age, early man already was able to fashion simple tools for everyday use and decoration from the bones and ivory of the animals they hunted or caught. By the Neolithic age, the craft of ivory and bone carving had already come full circle as these materials were used to make a variety of tools, such as awls and knives, and ornaments. In the

* The article in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 to 四八.

**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abstract on page — by Donald E. Brix.

Shang dynasty, artistic focus turned to bronze casting, but the art of ivory and bone carving continue to advance. Craftsmen not only exploited the basic features of these materials, but they were also inlaid and decorated with other materials, such as turquoise. The Western Chou followed Shang styles, and bone and ivory carving co-existed with the art of inlay. In the Eastern Chou, the art of painting rose, adding another dimension of decoration to bone and ivory works. In the Han dynasty, the art of engraved lacquerware became popular and the ivory and bone objects of this period were also decorated using this technique of fine engraving. In addition, the lines were often filled with pigments to add an opulent beauty to the objects. The end of the present paper concludes with a glimpse at the development of combs as seen in ten hair combs and comb handles among the objects donated from the Yü-ning-ting Studio.



國立故宮博物院

Key Word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bone and ivory carving 牙骨雕刻品

elephant ivory 象牙

fine engraving 針刻

hair comb 梳篦